

学术专论

医生、理发手术匠与保教权在华利益 ——耶稣会士卢依道与高竹在清朝的宫廷

白雅诗著 曹晋译

【摘要】本文详细叙述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十七世纪末清朝宫廷中的工作和生活。卢依道是在康熙皇帝特别要求下来到北京的第一位专业的耶稣会医生，与他一同前来的高竹是在澳门出生的理发手术匠。首先，本文着重讲述了他们来到中国的复杂旅途，以及在保教权耶稣会士和国王数学家的利益竞争之下，他们在北京的经历如何引起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内部的斗争。其次，本文还描绘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北京宫廷以及康熙皇帝出巡时的医学活动，包括他们与太医的冲突，照顾精英患者使他们对“仁医”理念渐行渐远。这些患者中也包括康熙皇帝本人，他在患病时利用了当时简陋的欧洲医疗。最后，本文考察了卢依道和高竹在北京的医疗活动在政治、宗教以及医疗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戛然而止的原因。

【关键词】耶稣会士 保教权 宫廷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7)-03-0021-30

（康熙皇帝）出于这种假设，向我们询问我们的药品以及用药方式。我们答以（药品的）确切成分，并指出欧洲的医生通过论证和辩争来决定如何用药——理性，但非绝对无误、明白及确定。

卢依道^①

卢依道（Isidoro Lucci S. J.）^②，一位耶稣会专职神父与医生；高竹（João Baptista Lima），一位在中国出生的理发手术匠。他们的命运因为那段在清朝宫廷的短暂时光而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于1692年7月12日共同抵达北京，并携手行医约一年之久，一起效劳于大清的康熙皇帝。然

【收稿日期】2017-03-10

【作者简介】白雅诗（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女，澳门大学助理教授，bpballesteros@umac.mo；曹晋（1982-），女，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助理研究员

① Lisbon, Biblioteca de Ajuda, *Jesuitas na Asia* (下文简称为JA) 49-V-22, f. 126r; José Caetano Soares (苏霖),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澳门和[葡萄牙]耶稣会: 医疗和社会全景),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Divisão de Publicações e Biblioteca, 1950, p. 500.

② 卢依道（Isidoro Lucci S. J.），1661年4月14日生于意大利诺尔恰（Norcia），1689年9月7日于罗马成为耶稣会士，1719年11月4日卒于越南东京。见 Joseph Dehergne (荣振华):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73, pp. 158-159.

而，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援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团，尤其是保教权^①耶稣会士。实际上，在耶稣会传教团内部，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即为人熟知的“国王数学家”与保教权耶稣会士之间早已存在分歧，而卢依道与高竹的到来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更为明显。当时，在北京的耶稣会士隶属于葡萄牙耶稣会，由耶稣会中国省副省会长葡萄牙人徐日升^②统领。但是，从那之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国王数学家的到来为之后“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成立播下了种子。这一组织独立于葡系耶稣会，并从1700年起由他们自己的团长管辖，第一任团长是身为国王数学家之一的张诚^③。

卢依道的重要性在于，他是首位在康熙朝抵达北京的接受过医学训练的欧洲人。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这段经历不尽如人意，但它标志着在康熙统治的最后三十年里，耶稣会士和其他教会以及普通教徒中的医生、手术师和药剂师纷纷来到清廷，冀图在行医之外，为教会的战略以及个人的利益发挥作用。多年来，皇帝信服于欧洲数学的准确无误，从而以耶稣会士为师，因此希望召集懂得医学的欧洲人来皇宫，上述战略正是基于康熙皇帝的这一想法。卢依道本人在任职于皇宫后提及过这一理由“事实上，一个异教徒国王唯一珍视的不过是不死和健康，他会认为欧洲医学与他所信服的欧洲数学一样准确无误。”^④

南怀仁^⑤意识到了这一点。在1685年3月16日的一件汉文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皇帝曾告诉南怀仁他有兴趣接纳精通天文学和医学的欧洲专家。^⑥天文学方面，南怀仁向皇帝推举了耶稣会士安多^⑦，但他最终成为了皇帝的数学、代数与几何老师。^⑧然而，在医学领域，南怀仁

① 中国传教团中的耶稣会士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他们都受到葡萄牙保教权的保护。保教权是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3年颁布的划分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在美洲新大陆的手段。一年后，《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签订对此进行了修改，并重新规定了两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于是，葡萄牙获得了亚太地区、日本、中国和菲律宾（1565年被西班牙帝国占领）的管辖权。条约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些地区不止于从事政治和经济活动，而且也要求他们在各自范围内承担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义务，以及为相关的传教工作负责。这被称作“皇家任免权”。国王数学家的到来是对这一权力分配的第一次严重威胁，导致了各方利益的紧迫竞争。这六位被选中为国王数学家的法国传教士分别是：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S. J. , 1643 – 1710），白晋（Joachim Bouvet S. J. , 1656 – 1730），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S. J. , 1656 – 1737），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S. J. , 1654 – 1707），李明（Louis Le Comte S. J. , 1665 – 1728）和塔夏尔（Guy de Tachard S. J. , 1648 – 1712）。详细介绍请参考 Isabelle Landry-Deron（蓝莉），“Les mathématiciens envoyés en Chine par Louis XIV en 1685”（路易十四于1685年派往中国的数学家），*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55. 5（2001），pp. 426 – 427，以及 Jean-Pierre Duteil, *Le Mandat du Ciel: Le rôle des jésuites en Chine*（天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角色），Paris, Editions Arguments, 1994, pp. 11 – 16.

② 徐日升（Tomé Pereira S. J.），1645年11月1日生于葡萄牙 São Martinho do Vale，1661年9月25日于科英布拉（Coimbra）成为耶稣会士，1708年12月24日卒于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 200.）

③ 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S. J.），1654年6月11日生于法国凡尔登（Verdun），1670年10月6日于南锡（Nancy）成为耶稣会士，1707年3月25日卒于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 108.）

④ JA 49 – V – 22, f. 125v; 苏霖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0.

⑤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S. J.），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皮特姆（Pitthem），1641年9月29日于梅赫伦（Malines）成为耶稣会士，1688年1月28日卒于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p. 288 – 289.）

⑥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以下 B. n. ），“manuscrits chinois”，MS 1330，“Xichao din gan”（熙朝定案），pp. 1a – 1b.

⑦ 安多（Antoine Thomas S. J.），1644年1月25日生于比利时那慕尔（Namur），1660年9月24日于图尔奈（Tournai）成为耶稣会士，1709年7月28日卒于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p. 270 – 271.）

⑧ Han Qi（韩琦）：“Antoine Thomas, SJ, and his Mathematical Activities in China: A Preliminary Research through Chinese Sources”，（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in Willy Vande Walle and Noël Golvers (ed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 – 1911),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Verbiest Foundation, 2003, p. 110.

却并不知道谁是专家。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在 1685 年 8 月 1 日致信罗马耶稣会总会长诺耶尔^①，信里表达了需要医学专家的迫切及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数学一直在支撑着基督教，但是医学一定会为基督教带来更大的力量。经证明，在教会受迫害之时，他们（中国人）肯定会更轻易地赶走一位（耶稣会）数学家；但是却不会这样对待一位著名的医生，因为皇帝认为医生是保障自己身体健康所必不可少的人。因此在宫廷里，他们（即医生）将一直为我们的教义提供根基（以资成长）。^②

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耶稣会士意识到医生作为战略工具的价值，可以巩固他们在康熙皇帝宫廷中的地位。在同一封信中，南怀仁表明了他的担忧，其他教会“方济各会（Franciscans [O. F. M.]）、道明会（Dominicans [O. P.]）、奥思定会（Augustinians [O. S. A.]）、巴黎外方传教会（French Vicars [M. E. P.]）以及主教们（传信部）（Propaganda Fide）”可能会抢占先机，从而他们“……将势力打入深宫”。^③ 皇帝期待一位欧洲的医生，而耶稣会士把握住了这一机会，使得这位医生必须是来自耶稣会。然而，卢依道并非独自前来，同行的还有一位世俗的理发手术匠高竹。因为卢依道刚刚获得医学学位就被派来中国，行医经验恐有不足，因此高竹被视为他的得力助手。卢依道将他在清廷度过的短暂时光写入了一封信，题为 *Relação do Succeso que teve na China, e Corte de Pequim da vinda do Medico Europeo*（《一个欧洲医生在中国以及清宫里的那些事》）。该信揭示了在康熙朝供职的受过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医生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但目前尚未得到深入透彻的研究。^④

① 诺耶尔（Charles de Noyelle S. J.），1615 年 8 月 27 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1630 年 9 月 29 日于比利时梅赫伦（Malinas）成为耶稣会士，1686 年 12 月 12 日卒于意大利罗马。（*DHCJ* II, pp. 1642 – 1643.）

② Rome,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即 ARSI），*Jap. Sin.* 145, f. 82r. 原信的拉丁文誊写版见 Henri Jossion and Léopold Willaert,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1623 – 1688），*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ékin*（北京天文台负责人耶稣会士南怀仁（1623 – 1688）通信集），Bruxelles, Palais des Académies, 1938, pp. 488 – 495.

③ ARSI, *Jap. Sin.* 145, f. 82r.

④ 这封信收于：Biblioteca de Ajuda, JA 49 – V – 22, ff. 125 – 140. 由于是手写版，所以并不是原件，而是“复制品”，它很可能是由意大利文翻译为葡萄牙文的。复制品中的签名显示为“Isidoro Lucci”，由此毫无疑问，这封信的内容是由他本人所述，尽管我们不知道是否或者有多少内容是被保教权的耶稣会士“修正”过的。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找到原件。在这封复制版信件中，卢依道被以第三人称叙述，先是 *Irmão médico*（医生兄弟），后来是 *Padre médico*（医生神父）。请见本文第 25 页脚注②。这封信件被苏霖（José Caetano Soares）抄写并出版。见：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p. 499 – 529. 在本文中我为读者们提供了原版与誊写版作为参考。对卢依道与高竹在北京的医疗活动的初步研究已有：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p. 39 – 52;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澳门医学），4 vols.,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vol. 3, pp. 18 – 23; Claudia von Collani, “Mission and Medicine in China: Between Canon Law, Charity and Science”（传教和医学在中国：在教会法规、慈善和科学之间），in Staf Vloeberghs et al. (eds.), *History of Catechesis in China*,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Leuven Chinese Studies, 18), 2008, pp. 48 and 49; 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 220 – 225 页；以及 Yves de Thomaz de Bossierre, *Jean – François Gerbillon, S. J. (1654 – 1707), mathématicien de Louis XIV, premier Supérieur général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Chine*（张诚（1654 – 1707）：路易十四的数学家和中国首位法国传教团团长），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Stichting, 1994, pp. 54, 106 and 197. 有关康熙朝的医学背景知识，请见：黑田源次《钦定各体全录》（康熙帝与西洋医学），《日本医史学杂志》，1943 年 1318 期，第 275 – 284 页；关雪玲《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 年第 1 期，第 99 – 111 页；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紫禁城出版社，2008，第 204 – 220 页；陈可冀、李春生《中国宫廷医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年，第 609 – 614 页；Erhard Rosner, “Über die Einflüsse der Jesuitenmissio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auf die Medizin in China”（关于 17 至 18 世纪耶稣会士医学在中国的影响），*Medizinhistorisches Journal* 5 (1970), pp. 106 – 114; Louis Van Hee, “Les anciens Jésuites et la médecine en Chine”（中国最早的耶稣会士及其医学），*Xaveriana* 135 (1935), pp. 67 – 89; Marta E. Hanson, “Jesuits and Medicine in the Kangxi Court (1662 – 1722)”（康熙朝（1662 – 1722）的耶稣会士和医学），*Pacific Rim Report* 43 (2007), <http://www.pacificrim.usfca.edu/research/pacrimreport/pacrimreport43.ht>; 以及 Puente – Ballesteros, “De París a Pekín, de Pekín a París”, chapters 2 and 3.

在本文中，我将在本人之前的研究基础之上^①，对卢依道和高竹行医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我所利用的史料，包括卢依道的信件，在欧洲各地与澳门的档案馆与图书馆搜集到的耶稣会内部通信和其他教会、宗教团体的通信，以及十七、十八世纪出版的文学资料和信件的汇编。此外，我还将利用汉文资料，如康熙年间的宫中档奏折以及其他的汉文档案。通过仔细研读这些史料，那些参与到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团体的各自利益将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并且使我们能进一步了解卢依道与高竹那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首先，我会考察卢依道从欧洲直至北京的漫长而又复杂的旅程。他在北京的活动引发了耶稣会士内部的斗争，因此，我将要重点讲述自从国王数学家到来后，在华耶稣会士之间的复杂利益纠葛。此外，我还将介绍卢依道的出身背景、医学专业，他加入耶稣会的过程，他希望被派遣去传教区的原因，以及他从欧洲来到北京和高竹由澳门至北京的历程。

其次，基于大量的医学病例档案，我将分析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中卢依道与高竹在宫廷的医疗活动：一种是在皇城中的宫廷，另一种则是在“行走中”的宫廷，即皇帝巡游期间，可谓“马背上的医生”。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将仔细观察那些医疗活动的参与者，重点分析卢依道、高竹与其他宫中人物的互动，其中就有来自太医院或其他地方的中医，而所有人又都处于康熙皇帝的监控之下。由于康熙的直接干预，卢依道和高竹被介绍给隶属于“皇帝网络”^②中的病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种医生在治愈病人过程中相互竞争，产生矛盾，而这正是双方互动关系的核心。至于医疗活动本身，我将介绍卢依道与高竹从操作小手术到开处药方所运用到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最后，我将着重强调，尽管卢依道对中医持有怀疑的态度，但鉴于欧洲药品难以补给的困难，欧洲与中国本土的药品与治疗方法仍是同时共存的。

文章的最后，我将从历史、政治、宗教以及医药的背景和条件下，探究导致了卢依道与高竹在北京短暂停留终止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也将分析他们的离开为北京耶稣会带来了哪些可能的后果。

从诺尔恰到澳门：“医生神父”的旅程

在康熙皇帝宫廷医生中，卢依道是唯一一位接受过医学训练的耶稣会专职神父（professed

① 见 Puente - Ballesteros, “De París a Pekín, de Pekín a París”。我的博士论文将于近期以 *Court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esuit Surgeons, Physicians and Apothecarie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angxi Emperor* (r. 1662 - 1722) (中华帝国晚期的宫廷医学：为康熙皇帝服务的耶稣会士手术师、医生和药剂师) 为题出版成书。

② 卢依道和高竹抵达北京的前后，康熙朝有所谓“皇帝网络”(imperial networks)，其定义和详情以及康熙对医疗活动的参与，请见拙作“Jesuit Medicine in the Kangxi Court (1662 - 1722): Imperial Networks and Patronag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4 (2011), pp. 86 - 162; 以及, “Antoine Thomas, SI as a ‘Patient’ of the Kangxi Emperor (r. 1662 - 1722):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 *Asclepio: Journal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64. 1 (2012), section 2 and 4. 中文版文章请见白雅诗著、董建中译《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皇帝的网络与赞助》，《清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7页；白雅诗著、董少新译《康熙帝的“病人”安多：对于清宫配用底野迦的个案研究》，《新史学》2014年第12期，第231-255页。

father)。其他的耶稣会士医生、手术师和药剂师，都只是会中的辅理修士（temporal coadjutor or brother）^①。正因如此，在他的信中，卢依道自称为“医生神父”（Padre Médico）^②。卢依道 1661 年 4 月 14 日出生于位于意大利佩鲁贾（Perugia）的斯波莱托（Spoleto）主教区的诺尔恰（Norcia）。^③ 在进入耶稣会之前，他在罗马学院学习了人文学和两年的哲学，并在罗马智慧大学（La Sapienza）修读了医学。^④ 1678 年，他 28 岁时，在获得医生学位之前，自愿加入耶稣会，并以被派去传教区的日本为明确的目标。^⑤ 然而，直到十年之后，他才抵达远东。葡萄牙耶稣分会认为他应该先完成第三年的哲学学习，并补修神学的课程，以备参加教会的晋阶考试（ad gradum）。^⑥ 1688 年，他完成了学业后，即刻联系了教会的日本与中国省负责人罗历山^⑦。罗历山在抵达罗马之前就收到了卢依道的学历证书。他们的见面被描述如下：

一个名叫卢依道的罗马学生，他是阿普里克斯（Aplicos [?]）地区圣会的教友，在罗马的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祈祷室中，拜倒在罗历山的脚下，恳求他的接受，并带他前往日本——他从小就感到了那里的召命。^⑧

罗历山在作出最终决定前，与卢依道的上级进行了商议。^⑨ 之后，葡萄牙耶稣会会长在了解了卢依道的背景，并且从闵明我^⑩那里得知了康熙皇帝想要邀请一名欧洲医生之后，把这一切禀告给了耶稣会总会长桑塔拉^⑪。桑塔拉将卢依道的使命由赴日本改为前往中国（途径印度），并要求他加入闵明我的远行队伍，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位于北京的中国修道会。^⑫

闵明我是第一位由康熙皇帝亲赐的遣往欧洲的钦差，且被耶稣会在 1686 年任命为罗马修道

-
- ① 在康熙在位的最后三十年里，曾有八位受过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除了卢依道外，其余人均均为耶稣会兄弟（即辅理修士）。他们是：鲍仲义（Giuseppe Baudino S. J. , 1657 – 1718），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 S. J. , 1664 – 1703），罗德宪（Bernard Rhodes S. J. , 1646 – 1715），何多敏（Giandomenico Paramino S. J. , 1661 – 1713），魏哥儿（Miguel Vieira S. J. , 1681 – 1761），罗怀中（Giovanni Giuseppe Da Costa S. J. , 1649 – 1747）和安泰（Etienne Rousset S. J. , 1689 – 1758）。见：Puente – Ballesteros, “De París a Pekín, de Pekín a París”, 3. 2. 斯皮诺拉神父（Francisco Maria Spinola S. J. , 1654 – 1694）曾试图将鲍仲义提升为专职神父，但未成功。见 ARSI, Jap. Sin. 165, f. 410r.
- ② 在同一封信里，卢依道也自称为“医生兄弟”（Irmão médico）。例如见 JA 49 – V – 22, f. 130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8. 当他于 1692 年 5 月 22 日在广州被授职为神父后，称呼则发生了变化。见 JA 49 – V – 22, f. 129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6.
- ③ Dehergne, *Répertoire*, p. 158;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 – 1773*（早期在华传教耶稣会士传记和书目介绍（1552 – 1773）,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p. 463; DHCJ III, p. 2434.
- ④ 见 DHCJ III, p. 2434. J. Ruiz de Medina 认为他在罗马智慧大学（La Sapienza）学习医学，但并没有为此论断提供详细的资料来源。Pfister 和 Dehergne 也都没有提及此事。另一个资料含糊地描述卢依道的医疗学习为 *laurea doctorali insignitus in facultatibus Philosophiae, Theologiae, et Medicinae*（拥有哲学、神学和医学博士学位）。见 ARSI, Jap. Sin. 25, f. 229v, “Catalogus Patrum et Fratrum Soc Jesu qui sunt in Provincia Japponica, Anno Domini 1691”. 又见 ARSI, Jap. Sin. 165, f. 396v, 徐日升（Tomé Pereira）寄于 1693 年 8 月 30 日的信。
- ⑤ JA 49 – V – 22, f. 126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1.
- ⑥ JA 49 – V – 22, f. 126v – 127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p. 501 – 502.
- ⑦ 罗历山（Alessandro Cicero），1639 年 5 月 28 日生于意大利科莫（Como）。1655 年 10 月 18 日于基耶里（Chieri）成为耶稣会士，1703 年 12 月 22 日卒于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 55）.
- ⑧ JA 49 – V – 22, f. 126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1.
- ⑨ JA 49 – V – 22, f. 127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2.
- ⑩ 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S. J.），1638 年 9 月 27 日生于意大利库内奥（Cuneo），1658 年 1 月 13 日于基耶里（Chieri）成为耶稣会士，1712 年 11 月 8 或 9 日卒于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 120）.
- ⑪ 桑塔拉（Tirso González de Santalla S. J.），1624 年 1 月 18 日生于西班牙阿尔甘萨（Arganza），1643 年 3 月 3 日成为耶稣会士，1705 年 10 月 27 日卒于意大利罗马。（DHCJ II, pp. 1644 – 1646）.
- ⑫ JA 49 – V – 22, f. 127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2.

会会长。^① 他的任务之一是试图化解与俄国的冲突，并找到一条新的连接欧洲与中国的陆上通道。康熙帝同时交给了他另一项任务，即物色一位欧洲医生，并将其带回大清的皇宫里。^② 然而，闵明我这两个任务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成功的。在政治方面，直到 1689 年 8 月 27 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清朝与俄国的斗争才算告一段落。这份条约是清朝与欧洲列强（俄罗斯帝国）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在这其中，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与法国耶稣会士张诚^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有了这份条约，在 1691 年，沙皇还是再一次禁止闵明我穿过俄国返回欧洲。^④

至于在物色医生方面，闵明我在返欧旅行中达成了皇帝的心愿，但人选不是某个欧洲或俄国的世俗医生，而是他的“自己人”。在他的欧洲长途旅行中，为了给中国耶稣会寻找经济和人力方面的支持，他行经了罗马、法国、慕尼黑、维也纳、马赛，士麦拿、波斯和果阿邦，最终返回北京。^⑤ 在这次旅途中，他募集了一名耶稣会医生和一名耶稣会药剂师。前者即卢依道，他在宫中停留的时间最短，而他也正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角。后者是鲍仲义，^⑥ 与卢依道相反，他是为康熙帝服务时间最长的耶稣会士执业医生，长达 24 年之久。

闵明我担心卢依道可能在医疗领域里的理论与实践操作之间存在缺口，于是要求他在启程赴中国之前先完成他的医学博士学位，这也是罗马医生的惯例。终于，一年之后，1689 年 9 月 7 日，卢依道在罗马完成了学业，并开始了他的实习期。^⑦ 仅仅两个月后，他离开罗马前往热那亚（意大利），然后乘船于 1690 年 2 月 2 日抵达葡萄牙，4 月 8 日开始了他从里斯本驶往中国的旅程。1690 年 11 月 2 日，抵达印度的果阿邦。^⑧ 印度原本应该成为他在抵达中国前的“实习实验室”。确切地说，闵明我命令他在果阿邦的皇家医院进行实习，^⑨ 这里从 1579 年起由耶稣会士掌管，他们的医疗能力一直以来得到了很高的赞赏，享有“医生知识丰富、药师尤其出色”的美誉。^⑩ 闵明我也期盼卢依道可以从果阿邦获取到当地药品的补给，以及尽可能地从当地医疗中学习到其他治疗方法。^⑪ 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未实现。一两日后，卢依道被送往稠饶（Chorao）进行修习，那是一座曼多维（Mondovi）河上的小岛，靠近帕纳吉（Panaji）（印度）。由那里他前往澳门，于 1691 年 7 月 15 日抵达。^⑫

① 另外，当南怀仁 1688 年去世时，闵明我仍在欧洲，即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1688—1707）以接替南怀仁。监正是法国耶稣会士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官位，但从未得到过。洪若翰希望申请此官职，但其薄弱的汉语是他的障碍，康熙帝以此拒绝了他的申请。在闵明我到来之前的过渡时期，徐日升和安多曾共同担任此职。见 Landry - Deron, “Les mathématiciens envoyés en Chine”, p. 440.

② JA 49 - V - 22, f. 126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1.

③ Joseph Sebes,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 - 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 (耶稣会士和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 徐日升日记),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ocietatis Jesu; 18), 1961, p. 139.

④ Dehergne, *Répertoire*, p. 335.

⑤ Dehergne, *Répertoire*, p. 120.

⑥ 鲍仲义 (Giuseppe Baudino S. J.), 1657 年 10 月 20 日生于意大利库内奥 (Cuneo), 1680 年 8 月 11 日于热那亚 (Genoa) 成为耶稣会士, 1718 年 12 月 24 日卒于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 27).

⑦ Dehergne, *Répertoire*, p. 158.

⑧ JA 49 - V - 22, f. 127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2.

⑨ JA 49 - V - 22, f. 127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2.

⑩ 见 Charles J. Borges, *The Economics of the Goa Jesuits, 1542 - 1759: An Explanation of their Rise and Fall* (果阿耶稣会士的经济, 1542 - 1759: 对其兴衰的诠释), New Delhi, Ashok Kumar Mittal, 1994, p. 28.

⑪ JA 49 - V - 22, f. 127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2.

⑫ JA 49 - V - 22, f. 127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3.

从澳门到北京：卢依道的“奥德赛”与高竹的雇用

卢依道觐见康熙皇帝的第二段航行开始了，这最终成为了一部真正的“奥德赛”。苏霖^①，北京学院（College of Peking）的院长，被皇帝派遣到澳门完成一个双重的任务。其一，迎接从欧洲回来的闵明我，但闵明我一直迟至1694年才到来^②；其二则是陪同刚从欧洲前来的医生即卢依道返回皇宫。然而，这项任务他也同样无法完成。在澳门的耶稣会神父们向苏霖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他们知道卢依道已被闵明我派来中国，但是他们认为，让一个“不成熟”的医生负责皇帝的身体健康实在太过鲁莽，因为这可能会给在中国的修道会带来很多不可预料的风险：

假如，在他（康熙皇帝）身上可能发生医疗过失（由于诊疗的不确定性与容易出错，这很有可能发生，也经常发生），这不仅会激怒他，更可能会造成皇帝的驾崩。

而且，即使我们的医生教友（卢依道）并没有在治疗过程中出错，但皇帝的疾病可能并不见效。就算见效了一次，两次，甚至十次，但最终皇帝不会长生不老，他会死于某种疾病。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的教友表现好坏，皇帝的驾崩都将被归咎于他和他的治疗，因此，他将始终处于死亡的危险中，尽管他可能是医学界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③

面对坚定且明确表示反对的澳门耶稣会神父们，苏霖最终与罗历山还有奥索里奥^④一起离开澳门，而闵明我和卢依道并没有随行。^⑤ 1692年，苏霖回到北京，觐见皇帝。康熙皇帝生气地说不想再见他，并不断追问其承诺过的欧洲医生之事。在这一微妙的情形下，苏霖以半真半假的禀告暂时宽慰了皇帝。他禀明，欧洲来的医生还是一个初学者，为了更好地为皇帝效劳，他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而且也需要熟悉中国的本土情况；与此同时，他也保证这位欧洲医生会很快抵达宫廷。^⑥

但是这个解释只安抚了皇帝几天，很快，他再一次愤怒地询问苏霖事情进展得如何。耶稣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这并不只是因为康熙皇帝对此的执着。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时在北京硕果仅存的两位“国王数学家”^⑦ 张诚与白晋^⑧，意识到康熙皇帝对欧洲医学的兴趣与皇宫中缺少欧洲医生的窘境，便毫不犹豫地回应了康熙的好奇心，尽管他们两个都不是接受过医疗训练的医生。在担任皇帝数学老师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回答皇帝对于疾病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则是基于医生里

① 苏霖（José Soares S. J.），1656年2月15日生于葡萄牙圣孔巴当（Santa Comba Dão）；1673年3月15日（或23日，或25日）成为耶稣会士，地点不明；1736年9月14日卒于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 256）。

② Dehergne, *Répertoire*, p. 256, 120.

③ JA 49 - V - 22, f. 128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4.

④ 奥索里奥（Manuel Osorio S. J.），1663年3月5日生于葡萄牙拉梅古（Lamego），1678年2月15日于科英布拉成为耶稣会士，1710年8月14日卒于澳门。（Dehergne, *Répertoire*, pp. 190 - 191）。

⑤ JA 49 - V - 22, f. 128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4. Louis Champion Ciccé M. E. P. (1649 - 1727) 在他的报告“Nouvelles particulieres de la China du mois de mars 1692”里证实了康熙帝知道卢依道已随罗历山抵达中国，并命令为他们来北京的旅程作准备。正如我们所见，只有罗历山遵旨前来。见 Rome, Archivum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Scritture riferite nei Congressi, Indie Orientali e Cina* (hence APF, *SC Indie Orientale e Cina*), vol. 6, f. 132r.

⑥ 国王数学家原本的六人团队解体了，塔夏尔（Gay de Tachard S. J.）留在了本地治里（印度）。李明、刘应和洪若翰在短暂地访问北京后，如他们所述，受上级的葡萄牙人所迫，离开了北京。刘应在上海定居，李明在陕西定居，洪若翰在南京居住了两年。见 Landry - Deron, “Les mathématiciens envoyés en Chine”, p. 445.

⑦ JA 49 - V - 22, f. 128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4

⑧ 白晋（Joachim Bouvet S. J.），1656年7月18日生于法国萨尔特省（Sarthe）的勒芒（Mans）或孔利（Conlie），1673年10月9日于巴黎成为耶稣会士，1730年6月28日卒于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p. 33 - 34; DHCJ I, p. 512）。

维埃^①的成果。在理论方面，他们开始了一部解剖学著作的翻译。^②同时，他们也为皇帝制作药品“蒸馏玫瑰水及其他香水，烈酒、糖浆，果酱，诸如此类，尽其所知所能。”^③

毫无疑问，法国耶稣会士一步一步地博取着皇帝的注意力，并以此从葡萄牙耶稣会中取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可能是他们这一欲盖弥彰的动机使得原本十分勉强的澳门神父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从而加快了卢依道来北京的步伐。令人诧异的是，卢依道自身对此也是不情愿的。他说，与其入宫为医，他宁愿去宫里“做任何其他工作，无论多低等，多普通，哪怕是厨师，我也更愿意服从”。^④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能违背上级的指令，他们认为送卢依道去北京的时机到来了。正如苏霖之前所言“我们在朝廷中的敌人会利用这个机会，使得陛下疑心大起，以为我们秘而不宣，却坐视陛下的健康和生命被剥夺。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⑤最终，副省长徐日升亲自向皇帝奏报了卢依道已经准备好来京行程并即将抵达的消息。实际上，徐日升认为没有人可以反抗一位皇帝对欧洲医生如此热切的期盼和渴求。徐日升如此向皇帝“推销”卢依道的医术：

该医生（卢依道）可以很好地阐释我们欧洲医学的“道理”或学术理论。至于他的实践或经验，他启禀陛下，尚未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已经是一名医生了。^⑥

卢依道在澳门的圣保罗耶稣学院（建立于1562-1563年）工作了将近一年，在这里有全澳门唯一的一家药房，是为耶稣会士、其他传教士、外国民众和当地百姓开具药方的中心。^⑦在此地此时，卢依道的第二段旅程正式开始，从而不可避免地将理发手术匠高竹与他的一生命运联结在了一起。

高竹的一生并不为人详知，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出生在中国，可能是一个皈依者。^⑧然而可以

① 里维埃（Lazare Rivière, 1589-1655）是著名的法国医生，曾担任过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御医。他在1611年被授予医生的头衔，1622年成为蒙彼利埃学院的教授，直至他离世。他著作之一是《医学体制》（*Institutiones medicae*, 1655），成为医学院的教科书。另一本是《医疗实践》（*Praxis medica*, 1640），因其实践性被广泛地使用，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治疗方法的说明。见 Louis Dulieu, *La médecine à Montpellier*（蒙彼利埃的医学），Paris, Les Presses universelles, 1975, p. 36。目前我们尚不知晓在这一事件中法国耶稣会士所查阅资料的具体书名。

② JA 49-V-22, f. 128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5。这很有可能就是巨著“Manchu Anatomy”（满文解剖学）。这个信息很关键，因为它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耶稣会士何时开始着手这一工作。这一著作有不同的满文题名。其中之一是 *Dergici toktobuha Ge ti ciowan lu bihe*（钦定各体全录）。关于题名的翻译，请见 Marta E. Hanson（韩嵩），“The Significance of Manchu Medical Sources in the Qing”（清代满文医学史料的重要性），in: Stephen Wadley, Carsten Naehrer and Keith Ded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Portland, OR, May 9-10, 2003), Vol. 1: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5, p. 147。此外，白晋和闵明我参与了编修满文版的欧洲医药学书籍的准备工作，该书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见关雪玲《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第220-221页。

③ JA 49-V-22, f. 128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5。

④ JA 49-V-22, f. 130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7。

⑤ JA 49-V-22, f. 127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3。

⑥ JA 49-V-22, f. 129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5。

⑦ Ana Maria Amaro（阿马罗）“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harmacopeia in the Prescriptions of the Jesuit Dispensaries”（中国医典对耶稣会药房的药方的影响），见：John W. Witek（魏若望）（ed.），*Religion and 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Fourth Centenary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St. Paul,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o, 1999, pp. 113-116；以及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3, pp. 6-8 and pp. 18-20。

⑧ 高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圈中长大。他曾去过果阿邦、巴达维亚、锡安以及其他地方。见 Ana Maria Amaro, *Introdução da medicina ocidental em Macau e as receitas de segredo da botica do colégio de São Paulo*（澳门西医和圣保罗学院的药剂秘方），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o, 1992, p. 95, footnote 83。

确定的是，与卢依道不同的是，他在澳门以理发手术匠为业，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① 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他们被一同送往宫廷是为了弥补彼此的不足，以保证他们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1692年5月12日^②，他们首站抵达了广州，在此卢依道于1692年5月22日由方济各会的伊大任主教（Bernardino della Chiesa O. F. M, 1644 – 1721）授以耶稣会专职神父，之后继续他赴京入宫的行程。^③ 根据康熙皇帝的旨意，卢依道与高竹由两广总督的一名差官陪同前往北京，并由其负责旅途的费用。^④ 康熙皇帝也从朝中派遣了两名官吏取道南京和南昌府（江西省），确保他们顺利抵京。但似乎官员们并没有在途中找到他们。于是，在他们启程的两个月之后，1692年7月12日，皇帝派苏霖在北京的城门迎接他们。^⑤ 在国王数学家抵京四年之后，他们终于到来了，此时正是耶稣会内部法国传教士与保教权耶稣会士斗争的紧要关头。^⑥

当卢依道和高竹抵达后，皇帝立刻接见了他们，并考察他们的医学知识直至深夜。^⑦ 两人都不懂满语，^⑧ 这也是大多数为天子行医的医生一个共同之处。徐日升担任翻译，^⑨ 由他来传达皇帝的问题。皇帝向他们询问了用脉搏来诊断病情的技法，并针对自己的旧疾提了些问题。^⑩ “考试”圆满结束之后，一个太监就带他们去了距离东堂^⑪两里的住所。^⑫ 第二天，“考试”继续进行，皇帝命令卢依道进宫面圣。这次，皇帝询问了他如何评价法国耶稣会士给他之前的各种小病

①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3, p. 51.

② Dehergne, *Répertoire*, p. 158.

③ 见 Georgius Mensaert (ed.), *Relationes et epistolas illmi D. Fr. Bernardini della Chiesa O. F. M.*, Romae, Collegium S. Antonii, 1954 (下文简称为 *Sinica Franciscana*, vol. 5), p. 274, 伊大任 (Bernardino della Chiesa, OFM (1644 – 1721)) 于1692年5月22日从广东写给 Angelicus de Venetiis O. F. M. 的信。同见 Georgius Mensaert (ed.), *Relationes et epistolas primorum fratrum minorum italarum in sinis (saeculis XVII et XVIII)*, Romae, Collegium S. Antonii, 1961 (下文简称为 *Sinica Franciscana*, vol. 6), p. 112, 廖霓赛 (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da Leonissa O. F. M. (1656 – 1737)) 于1694年1月14日从南京写给桑塔拉 (Tirso González de Santalla) 的信。

④ JA 49 – V – 22, f. 130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7. 同见 *Sinica Franciscana*, vol. 6, p. 179, 廖霓赛于1695年9月26日从南京写给颜瑄 (Charles Maigrot M. E. P. (1652 – 1730)) 的信。

⑤ ARSI, *Jap. Sin.* 165, f. 281r. 同见 *Sinica Franciscana*, vol. 5, p. 274, 伊大任于1692年5月22日从广东写给 Francesco Saverio Filippucci S. J. (1632 – 1692) 的信。

⑥ 因为法国传教士拒绝发誓遵从教皇在远东的代牧，而保教权的耶稣会士都发誓遵从佩德罗二世 (1640 – 1706) 的指令。这一誓言被传信部在1689年1月6日勒令废除，这是为了限制葡萄牙在传教区的势力。见 John W. Witek (魏若望),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 – François Fouquet*, S. J. (1665 – 1741) (欧洲与中国思想的争论：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记)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82, p. 49.

⑦ JA 49 – V – 22, f. 130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8.

⑧ 卢依道在被派往北京之前在澳门生活了一年，可能会一些澳门语，*patuá* 即澳门土生葡语（一种基于葡语但受到粤语和马来语影响的语言）、粤语和汉语。高竹，虽有中国血统，但居住在澳门，说澳门语、粤语，有可能也会说汉语。这样看来他们两人都决不可能了解满语。

⑨ JA 49 – V – 22, f. 132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11.

⑩ JA 49 – V – 22, f. 130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8.

⑪ JA 49 – V – 22, f. 130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8.

⑫ JA 49 – V – 22, f. 138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22. 同见 ARSI, *Jap. Sin.* 149, f. 539v. JA 49 – V – 22, f. 130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8.

所开的药方。这一次，卢依道有理有据的回答令康熙非常满意。^①

终于，卢依道这段复杂的旅程结束了，他最终没有独自一人来到北京，而是有高竹作伴。然而，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北京并不是他们在这一教区的旅途终点。

卢依道与高竹的医疗活动，“马背上”的医生与理发手术匠

当他们在北京就职安顿下来后，卢依道和高竹，或分开或一起，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工作，一以医生，一以理发手术匠，为康熙皇帝效劳。他们取了中文名字，即卢依道与高竹。^②此外，作为御医，他们只有在得到皇帝的允许或“知道”后才能去见病人。^③

从卢依道与高竹所进行的医疗活动的空间上来看，我们可以根据张勉治所提出的观点，将之定义为“马背上”的宫廷。^④因此，他们不仅要在北京的皇宫里，也要在皇帝巡游时负责医治。皇帝巡游是清帝国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这是皇帝巡视全国重要地方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每年康熙皇帝都会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度过多于六个月的时光。如此，他为卢依道和高竹特意定制了“两套戎装”。^⑤康熙出巡最常去的地方是位于北京郊区海淀的畅春园，通常都有耶稣会士陪同。而每年的北巡，则是由耶稣会士陪同皇帝一起前往位于热河的避暑山庄，康熙一般会在这里居住三到四个月，以躲避北京的高温。^⑥

康熙皇帝通常会优先选择带一名耶稣会手术师随行出巡，也会同时带一名耶稣会药剂师或医生。他们将与太医院的太医们、鞑靼的大夫、喇嘛教的医生、蒙古医生以及萨满和针灸医生一起陪同出巡。这些人从宫内医生中选出，很可能是由康熙皇帝亲自挑选出来的。他优先选择携带手术师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巡游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生各种外伤病，如擦伤、创伤和骨折。在这其中，可能由于射击或者其他活动造成伤病，此外，一些由于上述病痛引起的复杂症状，如坏疽、溃疡，也时有发生。同时，耶稣会医生和药剂师也会在此过程中收集植物物种，以便回京后在位于皇城内的药局中将其制成药品。^⑦

① 出于战略考虑和在传教士内部斗争之下，法国传教士通常对卢依道的医学知识持批判态度。洪若翰 (Fontaney) 在信中提及 “Je suis persuadé que le P. Bouvet sais mieux l'anatomie, le corps humain, les diverses sortes des maladies et les remèdes qu'il faut appliquer que le P. Luki [Lucci] tout médecin qu'il est.” (我相信，和身为医生的卢神父相比，白晋神父更了解解剖学、人体、各种疾病及其应对措施)。洪若翰于 1692 年 10 月 7 日从韶州写给 Champion de Cicé M. E. P. (1648 – 1737) 的信。见 Paris, Archiv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下文简称为 MEP), MS 405, f. 31r.

② 见 Dehergne (荣振华): *Répertoire*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第 372 和 379 页; 董少新 《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 201—202 页。

③ 在清朝，太医院为皇帝和他的宗亲们提供私人的医疗服务。因此，患者在被太医诊治之前，都要先通过奏折禀报皇帝。接着皇帝在奏折上朱批以“知道了”，以示批准。见 Chang Che-chia (张哲嘉):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 – 1908) (医疗的较力: 慈禧时期御医与患者的关系),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8, pp. 36 – 40 and pp. 51 – 53; Puente-Ballesteros, “De París a Pekín, de Pekín a París”, chapter 2, Puente-Ballesteros, “Jesuit Medicine”, pp. 93 – 98, and Puente – Ballesteros, “Antoine Thomas, SI as a ‘Patient’”, section 1.

④ 对康熙在位时期巡游的描述，可见 Michael G. Chang (张勉治):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 – 1785* (马背上的朝廷: 1680 – 1785 年清帝出巡与清朝统治的构建),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73 – 86.

⑤ JA 49 – V – 22, f. 133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12.

⑥ 康熙在位时期出巡的具体时间与持续长度，见 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p. 116.

⑦ M. L. Aime – Martin (ed.),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avec quelques relations nouvelles des missions, et des note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Tome troisième, Chine,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下文简称为 LEC), p. 345.

医生卢依道和理发手术匠高竹也加入其中，但由于他们在宫廷中停留的时间很短，我们只能确定他们曾陪同康熙皇帝于1692年9月8日第四次出巡鞑靼^①以及去木兰围场^②狩猎。下面是张诚描述的出巡，从中可见卢依道与高竹在满足皇帝医疗需求中起到的作用。张诚提到，1692年10月4日，他们在进行猎鹿时发现了两只老虎。康熙皇帝用大步枪射击了两次，一只被打伤，另一只则逃跑了。受伤的那只老虎又被二皇子和八皇子刺中，暴怒欲食人，最终被围猎者们用长矛杀死。皇帝将虎爪赐予了向他索求的“澳门来的手术师”（Chirurgien de Macao）[高竹]。此人说道“当孩童哭闹并拒绝吸乳时，将一只虎爪放在他的肚子上，如果小孩的病是风症^③，那么虎爪会蜕皮。”高竹还宣称虎爪是制作治愈瘰癧药膏的重要药材。^④这些用药、制药的信息展示了高竹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医学知识。^⑤

关于这次出巡，张诚还详细描述了1692年10月17日发生的事情。康熙皇帝派遣“欧洲手术师”（Chirurgien européen）[卢依道]和其他两位耶稣会士一起去诊疗他的妻弟——已故皇后的弟弟，这位病人居住在距离他们驻地100里的村庄里。^⑥病人的父亲是皇帝的舅父，医生应他的请求而被派遣。这位父亲告诉皇帝，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之前被派来的太医都束手无策，所以他才恳求康熙皇帝赐给他欧洲医生前来探病。皇帝非常看重这一家族，于是赐予了他所带来的所有欧洲药品，期望可能会适用于治疗病人的疾病。“这是一种恶性热病，将会很快夺走他的生命。”^⑦一天后，皇帝被告知，卢依道和其他耶稣会士抵达时发现病人已经濒临死亡，无药可救了。张诚将康熙皇帝对此的反应记载如下：

皇帝让报信人为患者送去我进献的“平民药膏”，^⑧这个药康熙之前多次试用过，均非常有疗效；但是他们去的太晚，病人已经几乎要断气了。他们给他服用了两撮白色粉末，使得他略微动了动。然后他们听到他内脏发出的震动声，似乎要呕吐，但他已经没有了力气，

① 张诚提及卢依道与高竹参与了康熙八次出巡鞑靼中的一次。他们的名字没有被提到，而是以“欧洲手术师”或“澳门手术师”代替。见 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 - 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vols, La Haye, H. Scheurleer, 1736, vol. 4, “Quatrieme voyage du pere Gerbillon en Tartarie fait a la suite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 p. 383. 同见 B. n. F., *manuscripts françois* MS 25057, ff. 453r et seg.

② JA 49 - V - 22, f. 133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12.

③ “风”在中医学历史中是被广泛讨论的疾病分类学因素之一。“风”被认为是很多疾病的诱因，包括传染病和神经病学，例如癫痫和精神病问题。见 Angela Ki Che Leung (梁其姿): *Leprosy in China* (中国麻风病史),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1 - 53 and 214.

④ Du Halde, *Description*, vol. 4, p. 383.

⑤ 在宋朝，虎爪被认为可以用来驱除体内的恶魔和邪气，即“爪辟恶魅”，尤其常被用于挂在小孩子的脖子上。见唐慎微著《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曹孝忠等于1116年重校，张存惠于1249年增订，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第384页。我非常感激久保辉幸博士为我提供了这些信息。虎爪的治疗效果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见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3842—3849页。书目的翻译见：Paul U. Unschuld (文树德),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 (中医药剂学史),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145.

⑥ Du Halde, *Description*, vol. 4, pp. 383 - 384.

⑦ Du Halde, *Description*, vol. 4, p. 384.

⑧ 又见白晋的日记，见 Claudia Von Collani (柯兰霓) (ed.), *Joaquim Bouvet S. J.: Journal des voyages* (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ew Series; 95), p. 80, footnote 204. 在他的日记里，白晋提到给了康熙一种药品。柯兰霓认为，它是 Mr Calotiet 用三种药膏制成，名为“平民药膏”。大体上说，这个药品是一种膏状物质，不仅由 Calotiet，其他医生也进行配制。它是通过减少药物中原成分的种类以及用便宜的原料取代珍贵药材而制作的廉价药。我发现金鸡纳也属于此类。见 APF, *SC Indie Orientale e Cina, Miscellanea 2*, ff. 425v - 426r. 我完全同意柯兰霓的观点，他们将给平民的药品用在康熙皇帝的身上，滑稽而矛盾。

不多久就去世了。^①

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医药的兴趣和知识，也可以得知他对于皇权网络中的病人的干预。可见，康熙皇帝在宫廷的医疗结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卢依道和高竹应该有所预料的。

医生神父的女病人

在关于卢依道和高竹的医疗活动的记录中，欧洲资料极其重要，因为中文资料在某些事例中的记录并不是很详细。比如，欧洲资料展示了康熙关心的女病人群体。事实上，在卢依道刚开始他的工作时，康熙就问他欧洲医生是不是可以医治所有人。这个问题暗示了皇帝想要知道他们如何对待女性，而这也使得卢依道陷入了窘境。为从中脱身，他答道：世俗的医生是可以医治所有人的，而“医生神父”却不可以医治女病人。^② 事与愿违，卢依道并不充分的理由没有打消康熙皇帝的念头。他没有理会卢依道的言语，而是给他送来了一连串的女病人，这些病人已经被太医们放弃了治疗，于是卢依道成为她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卢依道的女病人中，我们可以着重研究三例。第一例中的女病人患有一种歇斯底里症，也被称为“产妇病”。^③ 卢依道并不了解这种病况以及可能的治疗方法，抗旨拒诊，结果惹怒了康熙皇帝，迫使他出诊，并将他从东堂的住所迁到皇宫旁距离女病人很近的地方居住，直到治疗结束。^④ 对此，卢依道表明了自己缺乏在此领域的经验，并以此作为停止继续诊治的理由，但是康熙皇帝始终坚持，最后耶稣会副省会长徐日升命令并催促卢依道接受病人，不要再耗费皇帝的耐心了。^⑤ 之后，卢依道在这场诊治中表现非常成功，尽管病人的治愈更多地被归功于上帝的眷顾而不是卢依道的医术。另一方面，他的医术使得他名噪宫廷：

皇帝和整个皇宫都得知了那个欧洲医生治愈了病重的女人，他的名气大到令人难以置信。据说他可以起死回生，只需诊脉即可使人痊愈。^⑥

第二个病例是一位官员的妻子，被诊断为“危重肺癆”。^⑦ 在康熙的命令下，卢依道不得不天天去那位女病人在皇城中的住所探病。^⑧ 我们无法找到这次诊治的记录，但有一条线索，即卢

① Du Halde, *Description*, vol. 4, p. 384.

② JA 49 - V - 22, f. 130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8.

③ JA 49 - V - 22, f. 131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9. *Mal de madre* (产妇病)，在中世纪被视为一种医学中的癔症 (hysteria)。用浓烈的气味甚至恶臭为患者治疗。见 María del Pilar Cuartero and Maxime Chevalier (eds.), *Floresta española, escrito por Melchor de Santa Cruz de Dueñas*, 1574 Barcelona, Critica, 1997, p. 129. 此病又叫作 *Madrejón*，产婆或其他帮助接生婴儿的人，将胎儿形成与成长的女性器官 (即子宫) 叫作 “*madre*”。治疗方法之一是将手如十字架般交叉，放在疼痛的位置上祈祷。见 James F. Burke, “The Mal de la Madre and the Failure of Maternal Influence in *Celestina*” (“产妇病” 和《塞莱斯蒂娜》中母亲影响的败落), *Celestinesca* 17. 2 (1993), pp. 111 - 112.

④ JA 49 - V - 22, f. 131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9.

⑤ JA 49 - V - 22, f. 131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9.

⑥ JA 49 - V - 22, f. 131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09.

⑦ JA 49 - V - 22, f. 131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10. 肺癆 (Phthisis) 是一种结核病，公元前 460 年由希波克拉底将其定义为肺部、胸腔以及喉咙溃烂，表现为发热、咳嗽和化脓。17 世纪后，欧洲出现了肺结核传染病，被人们称为 “白死病”，两百年间肆虐不断，成为夺走欧洲 18 - 35 岁人群生命的主要疾病，却没有有效的疗法。见 Thomas M. Daniel, “The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肺结核的历史), *Respiratory Medicine* 100 (2006), pp. 1862 - 1863.

⑧ JA 49 - V - 22, f. 131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10.

依道抱怨他对这位病人的尽力诊治使得他无法分心给其他的病人治疗。^①

第三个病例是一位伯爵的夫人，她的病情没有记载。卢依道再一次挑战了皇帝的命令，但这次抵抗和诊治女性无关，因为似乎他已对此习以为常了。他的拒诊是因为他了解到病人此前接受过中医的治疗。^② 这个例子很明显地展现了在宫廷中不同的医者互为干涉，以及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冲突。

皇九子胤禔的腮腺炎

在上述案例中，我们没有关于卢依道诊疗手段或者开处药方的信息。然而，有证据显示，卢依道最初的成功一部分需要归功于与高竹的合作。高竹是一位治疗“脓疮、瘰癧、严重溃疡以及眼疾”的专家。^③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1692年8月给胤禔（1683–1726）的诊治。^④ 他是康熙的第九位皇子，也是他最疼爱的皇子之一，尽管在康熙皇帝在位时期他不曾担任过重要的官职。^⑤

胤禔的病是腮腺发炎，耳朵里已有脓肿。^⑥ 太医不敢治疗，却在康熙皇帝面前贬斥高竹的提议。高竹建议用烧红的铁器把脓肿刺破，使其流脓两三天。^⑦ 在别无他法之下，康熙皇帝最终接受了高竹的方法，允许他无视中医的意见，在卢依道的协助下进行手术。他们遵旨实行手术，所有人都胆战心惊。^⑧ 当晚，卢依道和高竹在手术结束后刚刚回到住所，便被紧急召回，因为病人昏厥不醒，恐怕命不久矣。他们立刻来到皇子的住所，同行的还有充当翻译的徐日升、太子胤初（1674—1725）^⑨ 和赵老爷（赵昌）^⑩。康熙命令胤初让卢依道为病人把脉，并如实禀告他的情

① JA 49 – V – 22 , f. 131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0.

② JA 49 – V – 22 , f. 131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0.

③ JA 49 – V – 22 , ff. 131r – 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09.

④ JA 49 – V – 22 , f. 132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0 – 511.

⑤ 胤禔曾向穆敬远（João Mourão S. J. , 1681 – 1726）学习拉丁语和葡萄牙语。康熙死后，胤禔支持了在夺嫡中失败的一派。在他的四哥胤禛继位成为雍正皇帝后，胤禔被囚禁起来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满语意为“猪”。见 Arthur W. Hummel（恒慕义）,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 – 1912)（清代名人传略）, 2 vols. ,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 1944 , vol. 2 , pp. 927 – 929.

⑥ JA 49 – V – 22 , f. 132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09.

⑦ JA 49 – V – 22 , f. 132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0.

⑧ JA 49 – V – 22 , f. 132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1.

⑨ 胤初（1674—1725）在1676年1月27日被立为皇太子，之后失宠。1708年，在每半年举行一次的热河行围时，康熙皇帝宣告天下，太子无德，荒淫无度，谋权篡位以及叛国。他的太子之位因此被废，并被监禁起来。Hummel , *Eminent Chinese* , vol. 2 , pp. 924 – 925.

⑩ 赵老爷即赵昌，是紫禁城中养心殿的满人属官之一。养心殿在康熙时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休息的地方，耶稣会士和其他欧洲人也曾在此与康熙商讨政事，在这里他们得以见到皇帝。赵昌负责接洽与欧洲人有关的一切事务。他的满文名字叫 *Joocang*，他也经常被耶稣会士称为“Chuliama”。在宫中档案折中他被称为“武英殿总监造”。他与徐日升、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S. J. , 1665 – 1741）、穆敬远关系亲近，但他却不喜大部分法国耶稣会士。见 Claudia Von Collani（ed.）, *Joaquim Bouvet S. J.* , p. 86 , footnote 208; Antonio Sisto Rosso ,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派遣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使徒）, South Pasadena , Perkins , 1948 , p. 234; 以及 Catherine Jami , “Tomé Pereira (1645 – 1708) , Clockmaker , Musician and Interpreter at the Kangxi Court: Portuguese Interest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Science”（康熙朝的钟表匠、音乐家和翻译官：葡萄牙的利益和科学传播）, in Luis Saraiva and Catherine Jami（eds.）, *The Jesuits , 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 (1552 – 1773) ,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3）, 2008 , pp. 187 – 204.

况。卢依道回答道“皇子并无大碍，只因他身边人喧闹而引发的恐慌才导致了这种情况。”^① 赵昌随后让太医来为九皇子诊脉，他们同意卢依道的诊断。看着自己儿子明显好转，康熙皇帝训斥了众太医，并威胁将他们革职拿办。^②

卢依道行医的失败？

刚才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宫廷医药斗争的例子，这次以欧洲医生的胜利告终。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接下来的这一事例。事情发生在卢依道和高竹与徐日升陪同皇帝一起围猎数日的返程中，皇帝被告知一位重臣、皇叔之子得了病。病情本身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康熙皇帝派遣卢依道为其诊治，他为病人开了使他发汗的药方。^③ 然而，病人和他父亲一面感激皇帝的特别眷顾，一面继续请教中医，无视卢依道的治疗意见。面对病人每况愈下的情形，皇帝又派卢依道前往诊治，这一次，他提出要使用灌肠剂^④。但是病人的父亲又一次不听从卢依道，而选择相信中医。于是康熙皇帝第三次介入，在病人病危的时候再派卢依道前去医治。这次他断定已经为时太晚，病人很快就会“在一片血泊中死去”。^⑤ 康熙皇帝不顾卢依道的诊断，问他是否还有任何方法、任何药品可以救活病人，但卢依道答以无能为力。万不得已之下，康熙命令高竹去为病人放血。但正如卢依道的诊断，病人在第二天早上去世了，死前“忍受病痛折磨了十四天，伤寒斑疹遍布全身（即出疹性斑疹伤寒）”。^⑥

另一个卢依道诊治失败的事例是一位由外地来京、患有肥胖症的满人官员，他的儿子即将迎娶康熙皇帝的公主。^⑦ 康熙皇帝派卢依道去为此人诊治，卢依道开了欧洲的药品，并嘱咐了药的剂量和服法。同时，康熙皇帝又派遣两名太医前去诊治，并给出了他们的药方。患者选择信任后者。当卢依道发现他所开的药原封未动，只是在他面前假装药品已被递送后，才得知真相。那位患者在十或十二天后便病逝了。^⑧ 很显然，有些患者一边感激康熙皇帝对他病情的重视并保证将谨遵卢依道的医治，一边却仍然求助于中医药方。

第三个案例是一名患有长期慢性病的官员，他的病会偶然急性发作，只能卧病在床。因为长期以来的中医治疗无法使得患者痊愈，于是卢依道受皇帝的派遣前去诊治，成了患者最后的希望。患者一面告诉充当翻译的徐日升，卢依道开的药有疗效；但另一面，他命人转告皇帝，自己并没有觉察到任何起色。^⑨

从上述三个案例可以看出，中国的患者（满人、蒙古人和汉人）拒绝遵从卢依道的治疗，阻碍了他在清廷的工作，因为疗效直接关系到他在宫中的去留。这一事实因患者的左右为难而更加复杂，他们无法拒绝康熙皇帝恩赐的治疗，即卢依道的诊治。此外，卢依道数次抱怨中医把欧

① JA 49 - V - 22 , f. 132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1.

② JA 49 - V - 22 , f. 132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p. 511 - 512.

③ JA 49 - V - 22 , f. 133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3.

④ 灌肠剂是一种通便的药物。在十六、十七世纪，用盐灌肠甚至被认为是救治将死和中风患者的方法。参见 Noel G. Coley, “Physicians , Chemists , and the Analysis of Mineral Water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Chemistry’” (医生、化学家和矿泉水分析 “化学最难之处”) , 以及 Christopher Hamlin, “Chemistry , Medicine ,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English Spas , 1740 - 1840” (化学、医学和英国水疗的合法化, 1740 - 1840) , 均收于 Roy Porter (ed.) , *The Medical History of Waters and Spas* , London ,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edical History Supplement; 10) , 1990 , pp. 56 - 66 and 69 - 78.

⑤ JA 49 - V - 22 , f. 133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3.

⑥ JA 49 - V - 22 , f. 133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3.

⑦ JA 49 - V - 22 , f. 133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3.

⑧ JA 49 - V - 22 , f. 133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3.

⑨ JA 49 - V - 22 , f. 134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4.

洲医生当做替罪羊。在宫中各方医者竞争的背景下，中医动辄将一些患者的病逝归咎于欧洲医生和治疗方法上。^① 同时，囿于获得药品的困难，卢依道对其自身的医疗活动也多有不满 “一些以欧洲方式制成的药品，可以在北京寻到，有些药品可以在皇帝的宫中找到。可是天知道这些药是怎么来的，因为这里没有欧洲的药剂师”。^② 这些情况使得卢依道和高竹陷入了非常复杂的境地。正如卢依道所言，医疗活动可能会成为中国耶稣修道会巩固和进步的威胁，因此，“能在宫廷发生的最大的好事就是不要让他 [即我] 服务”。^③

北京之旅的终结，天子的“间日疟”（tertian fevers）

我们可以想象，卢依道在参与担任天子的“御医”后，此时开始感受到了不安与危险。从那时起，他着手准备离开宫廷。在文章的这一节，我们将叙述他被卷入的这一事件如何促成了他的离开，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康熙皇帝的间日疟被法国耶稣会士进贡的金鸡纳所治愈的故事，但其中卢依道的参与却鲜少有人了解。白晋记录道，上述病症大约开始于1693年6月1至3日，当康熙皇帝让张诚为他提供一个可以治疗他脚上“痼疾”的方法时，他已经忍受疼痛十至十二日了，而这也给他的生命带来了威胁。^④ 张诚没有详细说明药剂的成分，在配药前，他先给另外一些人试了药，然后才在皇帝身上用药。康熙皇帝用后觉得自己顿时有了好转。然而，病情却发展为“间日疟”。^⑤ 白晋将此药的疗效不佳归罪于太医，因为是他们劝皇帝减少了规定的药量。^⑥

6月13日，康熙皇帝因其发热而召见卢依道，由此卢依道开始参与了治疗。之后康熙皇帝命令卢依道为他把脉，“脉象略有不稳”。^⑦ 康熙皇帝问卢依道他的生命是否有危险，卢依道回答目前看来没有。接着，皇帝下达命令让卢依道去对比之前闵明我给他的药品，以及弗洛伦萨大公^⑧为他提供的药品，判断哪一个可以用来治愈他的病。然而卢依道的回复却是否定的 “这些药里有些可以使他保存体力，安稳心神，如糖浆药水^⑨，树胶^⑩……但是它们都不能根除病痛，只能用于增强他的气力”。这个回答让康熙皇帝非常不满意，因为他期盼其中的一款药可以立即治愈他。^⑪

几日过后，康熙皇帝的病仍不见起色，他再一次问卢依道，大公给的药中是否有能“奇迹

① JA 49 - V - 22 , f. 134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p. 513 - 514.

② JA 49 - V - 22 , f. 134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4.

③ JA 49 - V - 22 , f. 134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4

④ ARSI , *Jap. Sin.* 165 , f. 419r.

⑤ ARSI , *Jap Sin* 165 , f. 419r.

⑥ Munich ,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 , *Codex Gallicus* MS 711 , f. 28. 转引自 Witek , *Controversial Ideas* , p. 63.

⑦ JA 49 - V - 22 , f. 134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5.

⑧ JA 49 - V - 22 , f. 134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5.

⑨ 糖浆药水（Juleps）是一种制药形式，它的运用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初。它是一种液体药品，由糖浆和一种适合治疗的液体配置而成，不可煮沸。糖浆药水的一种形式是糖浆兴奋剂，用于治疗普遍的身体衰弱，卢依道推荐给康熙的药品可能就是这一种。见 Jorge Buchan , *Medicina domestica ó Tratado completo del metodo de precaver y curar las enfermedades con el régimen , y medicinas simples y un apéndice que contiene la farmacopea necesaria para el uso particular. Escrito en inglés por el doctor Jorge Buchan , del Colegio de Médicos de Edimburg , traducido en castellano por el Coronel D. Antonio de Alcedo , Capitán de Reales Guardias españolas* , Madrid , Imprenta Ramón Ruíz , 1792 , p. xlv.

⑩ 树胶（Gums）是赋形剂，被用于制备不同药品，如糖浆药水。有诸多配方，例如两种包含树胶的配方，分别是糖浆兴奋剂（含有阿拉伯树胶）和祛痰糖浆（含有氨树胶）。见 Buchan , *Medicina doméstica* , pp. xlv y xlvi.

⑪ JA 49 - V - 22 , f. 134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5.

般”治愈他的，但卢依道依旧坚持他的观点。之后，卢依道突然记起并告诉康熙，可能有一种药可以治愈他，即金鸡纳，他将之描述为一种“可以治疗间歇性发热的良药”，^①但是由于北京没有这种药，他现在不能呈给皇帝，但他确定在澳门有。^②他期望康熙可以下达命令尽快将此药送来。但事与愿违，康熙没有原谅卢依道的“疏忽”，命他返回家中（即东堂），而让张诚和白晋留在宫中陪伴。“从此以后，康熙再也没有起用过医生神父，^③或问他医疗问题，然而，当实在有需要时，他会派人去询问省会长神父（徐日升），但却再也不提及医生神父了”。^④

康熙随后转向法国神父张诚和白晋去获得治疗之法，就像卢依道没来之前那样。这段情节并不只有卢依道有所记录，白晋自己也做了描述。^⑤他们一起献给了皇帝一个“药片”，白晋告诉他此药包治百病。^⑥据卢依道记载，康熙在太子胤初、索额图^⑦和其他负责皇帝药品之人^⑧的反对下服用了此药。结果则是康熙经历了一次“大通便”，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给皇帝的是一种强效泻药，这使得他倍感轻松，并声称自己痊愈了。^⑨然而，经过短暂的愉悦，第二天他开始继续发热。康熙再一次要求张诚和白晋为他治疗，他要求用别的药，并愤怒地告诉他们他不会再服用之前那种药，因为那根本就是无效的。^⑩这使得几位法国耶稣会士陷入了窘境，他们的同事抱怨道：

是谁让〔法国〕神父涉足这种危险品，还献给皇帝？〔法国〕神父和这些可能会给他们自己以及整个基督教带来灾难的药剂有什么相干？让他们去给圣约和数学布道就行了，药品的事还是交给医生吧。^⑪

① JA 49 - V - 22 , f. 135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6. 耶稣会士对金鸡纳的发现，可能是模仿秘鲁印第安人而得的。印第安人定期将它灌入身体，以缓解发热。耶稣会士看到后，也用此来治疗间歇性的发热。耶稣会士与美洲土著一起，负责收集金鸡纳树皮，将其磨成粉，然后售卖，耶稣会得其利。由于1650年后耶稣会对金鸡纳的发现，因此它也称作“耶稣会树皮”。实际上，耶稣会士进行垄断交易，从他们在利马与卡亚俄港口的学校将金鸡纳树皮运往塞维利亚港口，那里接收从美洲运来的物资。这些都是在红衣主教约翰·德卢戈(Juan de Lugo S. J. , 1583 - 1660) 的资助下进行的，他也是一位耶稣会士。事实上，他自己也加入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王储的间日疟治疗中，与红衣主教马萨林(Cardinal Mazarin , 1602 - 1661) 紧密合作。由此金鸡纳获得了“红衣主教的粉末”之称。见 Juan Riera , *Capítulos de la medicina española ilustrada (Libros , cirujanos , epidemias y comercio de quina)* (西班牙医学图集：书籍、外科医生、流行疾病和金鸡纳贸易) , Valladolid ,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 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 , 1992 , p. 82; Mauricio Nieto , *Remedios para el imperio: Historia natural y la apropiación del Nuevo Mundo* (救治帝国：自然历史和新世界的所有权) , Colombia ,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 1992 , p. 191; 以及 Londa Schiebinger ,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植物与帝国：殖民时期大西洋世界的生物勘探) ,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and London , England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 pp. 214 - 215.

② 的确，1713年10月自澳门而来的耶稣会士为康熙带来了金鸡纳以及另外两种药：底野迦(theriac) 和吐根(ipecacuanha) 。

③ 意为从此之后，整件事情就结束了，见本章随后部分以及第37页脚注①。

④ JA 49 - V - 22 , f. 135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6.

⑤ 见 Claudia Von Collani (ed.) , *Joaquim Bouwet S. J.* , pp. 79 - 82.

⑥ JA 49 - V - 22 , f. 137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9. 同见 Claudia Von Collani (ed.) , *Joaquim Bouwet S. J.* , p. 80, 以及第45页脚注⑥。关于这一问题同样可见本文第31页脚注⑧。

⑦ 应该就是 Sosan Laoye，即索三老爷。见 Joseph Sebes ,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 - 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 S. J. , (耶稣会士和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 : 徐日升日记) Rome ,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ocietatis Jesu; 18) , 1961 , pp. 24 - 25.

⑧ 这里可能包括太医院的太医们以及御药房的负责人。见陈永生、张苏萌 《晚清西医学文献翻译的特点及出版机构》，《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第2期，第76—77页。

⑨ JA 49 - V - 22 , f. 137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19.

⑩ JA 49 - V - 22 , f. 137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20.

⑪ JA 49 - V - 22 , f. 137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20.

然而，法国耶稣会士的角色并未就此终止。之后，在徐日升和六位朝中官员（其中三人为朝廷重臣）的面前，卢依道和高竹一同为康熙进行了放血疗法，立即退了烧。但是第二天却迅速恶化。^① 张诚赶紧和刚从广州回来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②与刘应^③一同看望皇上。他们将金鸡纳献给康熙，这便是卢依道曾在最初建议的药品，但却由法国耶稣会士率先得到，并在皇帝似乎已无药可救时进献给他。^④ 金鸡纳先是在六名患者身上试验成功，然后“奇迹般地”即刻治愈已被病痛折磨了一个月之久的康熙皇帝。^⑤ 我们可以在一份奏折中读到康熙是如何自述他的康复的。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693年6月29日），川陕总督佛伦的奏折中提到，他从他的儿子阿勒珠那里得知皇帝的两道谕旨，并从中了解了皇上的病情。在奏折里他复述了谕旨的一部分内容，即康熙皇帝对自己身体状况的陈述，如下：

服用御医等药不见效，故朕按西洋大夫之方配药服用后，睡眠稍安了……朕曾汗病，今因得汗，已痊愈了。^⑥

此外，在康熙给佛伦奏折的朱批里，他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康复，还解释了他在经历“间日疟”时（如卢依道之诊断）的一系列症状及发展。根据中医的诊断，康熙皇帝称之为“疟疾”^⑦：

朕自初八日始患汗病，十三日始疟疾，隔一日来一次，甚重，二十七日疟疾痊愈。朕体今大安了，好像旧病诸疾都已根除了。^⑧

在另一份奏折中我们得知佛伦为康熙寻找其他的治疗方法。在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① JA 49 - V - 22, f. 138r;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21.

② 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S. J.），1643年2月17日生于法国圣波勒德莱昂（Saint - Pol - de - Léon），1658年2月18日于巴黎成为耶稣会士，1710年1月16日卒于法国萨尔特（Sarthe）。（Dehergne, *Répertoire*, p. 97.）

③ 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S. J.），1656年8月12日生于法国特雷布里（Trébry），1673年9月5日于巴黎成为耶稣会士，1737年11月11日卒于印度本地治里。（Dehergne, *Répertoire*, pp. 294 - 295.）

④ 洪若翰说，他从本地治里的 Charles Francois Dolu S. J.（1655 - 1760）处得到金鸡纳。然而，因为洪若翰在广州，他同样可以从由 Blas García O. F. M.（1635 - 1699）经营下的广州方济会药房那里得到金鸡纳，而那里的金鸡纳则来自菲律宾和果阿邦。见 Severiano Alcobendas, “Religiosos médico-cirujanos de la Provincia de San Gregorio Magno de Filipinas (part IV): Religiosos franciscanos médico-cirujanos en China”（菲律宾圣格雷戈里奥马诺省的宗教医生和手术师（第四部分）：在中国的方济各会医生和手术师），*Archivo ibero-americano* 36, p. 162.

⑤ 卢依道在信中强调了法国耶稣会士成功地获得金鸡纳，却对其运送过程语焉不详。白晋和洪若翰则提供了详细的资料。白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是他说服了赵老爷将金鸡纳进贡给康熙皇帝；理由之一是金鸡纳在欧洲是很流行的一种药材，尤其在法国被视为治疗间歇性发热的良方，因为它治愈了路易十四和王后玛丽·泰蕾兹（Maria Theresa of Austria, 1638 - 1683）所生王储相同症状的病。这一理由貌似说服力不大，因为之后人们仍旧为金鸡纳的药效和安全性做了测试。药效测试由赵老爷、三位尚书、三位来自礼部的官员、一名御药房药师以及两名御医的组织下进行，三位患有间日疟的病人被成功治愈。而药物的安全性由皇帝亲自负责，他命令太子胤初把金鸡纳给了三个不同的健康的试验者，吃完之后都没有反应。在所有测试完成之后，皇帝才叫他的儿子令耶稣会士为他准备含有金鸡纳的药方，结果证明药效非常好，几乎立刻治愈了他的病。见 Claudia Von Collani (ed.), *Joaquim Bouvet S. J.*, pp. 90 - 98. 洪若翰详细介绍了康熙的治疗过程：首先是接受御医的治疗，但他们认为间日疟无法治愈，因此皇帝决定下旨在全国公开征询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和尚也参与进来，但最后还是没有成功。见 LEC, pp. 106 - 108. 洪若翰于1703年2月15日从距离宁波十八里格（约为3海里）的舟山写给皇家忏悔神父拉雪兹（François de la Chaise S. J.（1624 - 1709））的信。因此卢依道的说法是被删减过的，主要强调了法国和保教权的耶稣会士之间的斗争，却淡化了那些在法国耶稣会士给康熙进贡金鸡纳之前就参与到这场事件中的人物。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6条，第43页。

⑦ 疟疾的症状表现为间歇性僵硬、高烧以及出汗。金鸡纳作为对抗所有发热病症的灵丹妙药，可以有效地治疗上述症状。见原一祥编著《汉英双解中医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第642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6条，第43页。

(1693年7月11日)的奏折中,佛伦向康熙奏报了三副可能治好疟疾的神奇偏方。^①康熙皇帝在朱批里证实了自己病情已有很大的好转,很快会痊愈。^②

在佛伦呈上第二份奏折的一周前,即1693年7月4日,赵昌向耶稣会士传达了康熙皇帝的旨意,将为法国耶稣会士在皇城内建立一座新堂,以表彰他们用金鸡纳治愈了皇上的“间日疟”。^③在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的资助下,法国耶稣会士建立了北堂,于1703年12月9日完工。^④很显然,法国耶稣会士已经成功地朝他们的最终目标迈进了第一步,在康熙皇帝的亲赐下他们拥有了独立于保教权耶稣会士之外的教堂。此前,耶稣会士分居于西堂与东堂,东堂即法国耶稣会士的活动中心。保教权的耶稣会士极力反对这一举措,徐日升试图阻止法国耶稣会士搬往新教堂。^⑤

此外,保教权耶稣会士声称,康熙的赏赐并不只是给予法国传教士的,而是属于所有耶稣会士的。^⑥随后,时任钦天监监副的安多(闵明我不在时代代理监正),公开谴责法国耶稣会士一直图谋“分裂”的行为。^⑦鉴于此事对在中国的传教可能带来的组织上的影响,其他的教会也在内部通信中多有提及。从那些信件中清晰可见,权力的失衡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⑧

我们可以认为,这正是法国耶稣会士反复在他们的通信中强调这一献药事件的原因。因为他们极力试图呈现出治愈康熙间日疟与他们获得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这听上去更像是为掩盖背后的真正战略所作的辩解。^⑨然而,法国耶稣会士对这一事件的利用,通过将一封本是内部通信的信件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出版并得到广泛宣传而使其达到了顶峰,在该信中,洪若翰对上述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一作为宣传工具的信件汇编,其主要目标是促进耶稣会的整体发展,但尤其以法国耶稣会为重。事实上,这封信由洪若翰于1703年2月15日递交给了皇家忏悔神父拉雪兹(de la Chaise)。这也是北堂在康熙皇帝赐予的旧宅基础上建成的同一年。而这封信公开出版于1707年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七辑,正是在这一年,罗马教皇的特使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8条,第44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8条,第44页。

③ JA 49-V-22, f. 138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22. 与卢依道不同的是,洪若翰给出了具体赏赐的日期,并强调这是赐给朝中四位法国耶稣会士的,即洪若翰、刘应、白晋、张诚“皇帝赐予你们四人在皇城内的住所,即在皇宫的第一道围墙之内。”见LEC, p. 108.

④ 见W. Devine, *The Four Churches of Peking* (北京的四所教堂),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30, pp. 239-246. 至于建造北堂的资金来源,见Sebald Reil, *Kilian Stumpf, 1655-1720: Ein Würzburger Jesuit am Kaiserhof zu Peking* (纪理安(1655-1720):北京宫廷的维尔茨堡耶稣会士), Münster, Aschendorff (Missions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und Texte; 33), 1978, pp. 77-81.

⑤ 见Ronnie Po-chia Hsia, “Tomás Pereira, French Jesuits, and the Kangxi Emperor” (徐日升、法国耶稣会士和康熙皇帝), in: Luís Filipe Barreto (ed.), *Tomás Pereira, SJ (1646-1708): Life, Work and World*,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I. P. /FCT, 2010, pp. 354-355.

⑥ 参考鲍仲义的信。卢依道1694年离开后,同样是在闵明我的斡旋下,药剂师鲍仲义来到北京。1699年7月1日他在信中向杜加禄(Carlo Turcotti S. J., 1643-1706)批评此事。见JA 49-V-23, f. 709v.

⑦ See ARSI, *Jap. Sin.* 149, f. 541r.

⑧ 见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ed.), *Relationes et epistolae fratrum minorum saeculi XVII et XVIII*, Quaracchi,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1942 (hence *Sinica Franciscana*, vol. 4), pp. 525-526, 廖霓赛(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de Leonissa O. F. M.)于1693年9月11日从南京写给传信部主教颜珰(Charles Maigrot)的信。*Sinica Franciscana*, vol. 4, pp. 535-537, 廖霓赛于1694年1月14日从南京写给Emos Cardinalis S. C. P. F.的信; APF, *SC Indie Orientale e Cina*, vol. 6, ff. 337r-338v, 伊大任于1693年8月24日从南京发出的信。

⑨ 例如:白晋于1693年10月11日从广州写给维尔纽斯(Antoine Verjus S. J., 1632-1706)的信的摘录,和 ARSI, *F. G.* 730 I, ff. 192r-193v 与 ARSI, *Jap. Sin.* 165, ff. 419r-420r (两封信件相同)。

多罗在北京期间，爆发了中国礼仪之争。^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教会多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多方面的因素如何影响了这件事件的进程与结果。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洪若翰的叙述。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他描写的情节中，法国传教士是唯一出场的耶稣会士，而他作为主导，更是被描述为皇帝的“救星”，完全忽略了卢依道，那个曾最先向皇帝建议使用金鸡纳救治“间日疟”的医生。但是，卢依道同样谈到了上述事件，并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洪若翰笔下的法国耶稣会士，所作所为崇高、荣耀；与之相对，卢依道毫不犹豫地指出，法国耶稣会士在这次或之前的状况中，总是鲁莽地在最后一刻装作真正的医生，插手医疗，把康熙皇帝当作“小白鼠”，试用各种药品，而他们的行为却很有可能使耶稣会陷入到危险的境地中，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②

法国耶稣会士的“胜利”

法国人的第一次“胜利”以医生卢依道和理发手术匠高竹离开北京而告一段落，至此他们的宫廷生活还不足一年。令人惊讶的是，在“间日疟”事件发生之前，高竹就已经向康熙皇帝请辞要回澳门。由于当时康熙皇帝已赐给高竹一处在京中的住所，使得他和妻子可以生活在此，因此他的请求激怒了康熙，连累当时的耶稣会最高负责人、副省会长徐日升也一并受责。^③ 结果，在1693年2月5日，康熙皇帝下秘旨让洪若翰和刘应^④从广州返回北京，刘应此前在徐日升的指令下居住在远离北京的地方。^⑤ 恰恰在这次回程中，他们携带了日后治愈康熙间日疟的金鸡纳。这一证据揭示出，卢依道被送去北京是为了巩固耶稣会保教权的势力而防止耶稣会潜在的内部分裂，而高竹这个唐突的决定却很有可能导致了最终的爆发。

终于，康熙皇帝同意了高竹的请求，他将与“三老爷”（Sam-Lao Yé）以及耶稣会士奥索里奥（Manuel Osório）一同于1693年4月启程返回澳门。而后两者身负双重任务，不仅要护送高竹返回澳门，同时也要去会见闵明我。然而，他们一直延迟到1693年7月8日才动身，且又有两名新成员加入这一旅程，其一就是卢依道。他解释道，在他尝试救治康熙皇帝失败后，康熙皇帝允许他离开，因为他是一名医学理论专家，但皇帝更需要有实际医疗能力的人治病。这也正是皇帝赏识高竹的原因，他的离开则让康熙皇帝非常惋惜。^⑥ 与卢依道的观点相反的是，在中国的其他教会内部通信中，大家普遍认为卢依道的离开是由于他缺乏经验和医术。南京的宗座代牧、方济各会神父廖霓赛（Giovanni Francisco Nicolai de Leonissa O. F. M. , 1656 – 1737）在他于1694年1月4日写给传信部（S. C. P. F.）Emos Cardinalis的信中描述道：

最后康熙皇帝命令白晋出发去广州，去科罗曼德海岸进行皇家贸易，这件事的本质为何，尚不明确。皇帝赠予了白晋很多礼物，同时也命令耶稣会的卢依道返回澳门，他就是那个一年前从澳门被召唤到宫中为皇帝效劳的医生。确切地说，他是来教授欧洲医学的，当时

① Charles Le Gobien (ed.) ,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 Paris , Le Clerc , 1707 , 7 recueil , pp. 176 – 192 and 222 – 232. 洪若翰也反复地报告了这件事情。例如，在赐地之后不久，他于1693年7月7日从北京寄给在广州的夏尔莫（Nicolas Charriot M. E. P. , 1655 – 1714）的信中。见 MEP , MS 428 , f. 311r.

② JA 49 – V – 22 , ff. 137r – 138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p. 519 – 522.

③ *Sinica Franciscana* , vol. 6 , pp. 81 – 82 , 廖霓赛于1693年4月9日从南京写给 Louis Champion Cicé M. E. P. (1649 – 1727) 的信。

④ 有很多资料描述了此事。见 *Sinica Franciscana* , vol. 4 , pp. 535 – 536 , 廖霓赛于1694年1月14日从南京写给 Emos Cardinalis , S. C. P. F. 的信; *Sinica Franciscana* , vol. 5 , pp. 282 – 283 , 伊大任于1693年8月24日从南京发出的信; 以及 ARSI , *Jap. Sin.* 105 II , ff. 257 – 258.

⑤ Landry – Deron , *Les mathématiciens envoyés* , pp. 445 – 446.

⑥ JA 49 – V – 22 , f. 138v – 139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22.

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来自澳门的手术师，被召来做手术。卢依道被派去澳门获取医疗经验，另一个人的原因我不得而知。皇帝赐他们离开宫廷，这可不是一件小事。^①

第二个加入返回广州旅程的新成员是国王数学家之一的白晋，他将卢依道的“被迫”离开视为胜利，大加颂扬。^②这是他自己写给法国耶稣会会长波米耶^③的信中所作的总结。这封信于1695年12月21日从苏拉特（印度）寄出，信里白晋直接指出，医药作为权力和权势的媒介，被不同的天主教派系利用，以赢取皇帝的好感：

他们（卢依道和高竹）刚到达北京时，吹嘘自己的医学能力，皇帝就先让他们去诊治皇室的一位重要人物，甚至还有他的皇子。葡萄牙人当时为了他们的图谋，只想着在康熙面前展现他们的价值，而突显我们的无能，却没有预料到把他们自己和我们的宗教暴露于危险之下；然而，由于他们两人缺乏自信，尤其是可怜的卢依道，以他在罗马学到的医学能力想来不会差，但他的表现多次让我们非常疑惑。皇帝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在他们的鲁莽惊吓到每个人并带来恶名之前，把他俩送回了澳门。^④

而卢依道在他自己的信中，将法国耶稣会士用金鸡纳治愈康熙皇帝与白晋被任命为钦差（继闵明我之后的第二位钦差）返回欧洲这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康熙皇帝派白晋返回欧洲，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有学识的耶稣会士，同时也是为了从广东和印度得到更多的“灵丹妙药”，那样在白晋回京后就可以献给他金鸡纳的配方。^⑤对于白晋而言，则是试图建立中法外交关系，如同法国与暹罗之间一般。^⑥尽管白晋的外交使命最终失败，但他带回了12个耶稣会士，其中大多是法国人。在他们中有著名的耶稣会士医生兼药剂师罗德宪（Bernard Rhodes S. J.）和手术师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 S. J.）。^⑦

这次旅程的重要因素是京中不断增加的法国耶稣会士激化了他们与在钦天监里担任要职的保教耶稣会士之间的斗争。^⑧这一斗争是葡萄牙与法国在任免权上的国家利益冲突以及科学影响竞争的结果，且最终以1700年耶稣会总会长桑塔拉（Tirso González Santalla S. J.）将法国传教团从葡萄牙副省中分离出去而告终。张诚成为了第一任在华的法国传教团团长，与葡萄牙耶稣会副省会长徐日升有着同样的管辖权，而且他们同样都对来华的耶稣会士负责。^⑨这样一来，中国耶稣会内部最终走向了分裂，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法国耶稣会士的第二次“胜利”，这是由金鸡纳事

① *Sinica Franciscana*, vol. 4, pp. 537–538. 这封信包括了三十个要点以及一个由五点组成的附言。在第十四点中，他描述了洪若翰将金鸡纳进贡给康熙的情况，以及康熙治愈之后的结果，例如在皇城之内赐予教堂等。

② *ARSI, Jap. Sin.* 166, ff. 95r–v.

③ 波米耶（Jean Bomier S. J.），生于1621年，1639年成为耶稣会士，1705年2月18日卒于法国波尔多。（*ARSI, Aquitan.* 12, ff. 11r and 414r）。

④ *ARSI, Jap. Sin.* 166, ff. 95r–v. 这不是白晋唯一一次批评卢依道的医疗能力。另见 *ARSI, Jap Sin* 199 II, f. 390r.

⑤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22; *JA* 49–V–22, f. 139. 又见 *APF, SC In die Orientale e Cina*, vol. 6, ff. 337r–338v, 伊大任于1693年8月24日从南京发出的信。他在此信中指出，白晋被派往欧洲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法国药品”。

⑥ 见 Claudia Von Collani (ed.), *Joaquim Bouwet S. J.*, pp. 24–25.

⑦ 罗德宪与樊继训是“白晋舰队”的成员，但没有与白晋一起乘坐在 *Amphitrite* 号船。他们于1700年到达北京。见 Fortunato Margiotti (ed.), *Relationes et epistolas fratrum minorum hispanorum in Sinis qui a. 1684–92 missionem ingressi sunt*, Isola del Liri, Pisani, 1975（下文简称为 *Sinica Franciscana*, vol. 8），p. 165, José de Osca 于1698年11月13日从潮州府写给马尼拉省会长 Alonso de Zafra O. F. M. 的信。

⑧ Han Qi, “The Role of the Astronomical Bureau in the Catholic Mission during the Qing Period”（清代钦天监在天主教传教中的作用），in Noël GOLVERS (ed.), *The Christian Mission of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 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5–95.

⑨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pp. 110–109 and footnote 101.

件促成，且正如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所言，是在白晋将大量法国耶稣会士输入康熙皇宫的策略下完成的。^①

卢依道与高竹在中国最后的踪迹

我们的两位主角与奥索里奥、白晋以及“三老爷”最终在1693年8月22日抵达广州，那一天正是圣母元后节。卢依道和高竹从这里出发前往澳门，并于9月13日抵达^②，在那里分道扬镳。关于高竹，我们仅知道他后来曾居住在江西。^③那一年的9月26日，在卢依道和高竹离开后，康熙皇帝命令寻找可以接替高竹充任手术师之人，这突出表明了他在二人之间对高竹的偏爱。参议院总理会议（*Conselho Geral do Senado*）记载如下：“朝中派来的‘大人们’[钦差大臣]对审理委员会宣称，中国的皇帝希望他们可以带回席尔瓦（Antonio da Silva），接替皇帝所任用的高竹的手术工作。”^④选派席尔瓦医生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家人较少。此外，理事会决定席尔瓦一家在北京居住期间，每月可得到三个帕尔达乌（*pardaus*）。^⑤我们不能确定上述这位被称为“城市手术师”（*cirurgião da cidade*）的医生^⑥最终是否到达宫廷，因为直到十六年后，在刺杀澳门总督古尔露（António de Albuquerque Coelho, 1682 – 1745）未遂一案中才又提及他的名字。^⑦

至于卢依道，我们得知他最初被安置在澳门学院，不只是为了专门服务于宗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为了躲避医疗带来的危险。^⑧在澳门，他发誓要将一生奉献给东京（越南）耶稣会，之后上级长官便同意如他所请，派他前去。^⑨1694年4月15日，他抵达东京，尽管之前他貌似宣称放弃从事医疗，但在这里他转而成为当地居民开处方，以此来接近他们。^⑩1704年，他先是被任命为副省会长，接着在1705 – 1710年间又被任命为会长。从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东京的传教也并非一帆风顺。1704年10月，他刚一到任，便不得不前往广州与罗马教皇的特使多罗见面。多罗是被传信部派来处理中国礼仪之争的。^⑪由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传教士

① 见 Claudia Von Collani (ed.) , *Joaquim Bouwet S. J.* , p. 45.

② *JA* 49 – V – 22 , f. 139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23; Dehergne , *Répertoire* , p. 158.

③ *Sinica Franciscana* , vol 6 , pp. 1026 – 1027 , 叶宗贤 (Basilio Brollo da Gemonia O. F. M. , 1648 – 1704) 于1696年6月6日从南京写给梁弘任 (Artus de Lione M. E. P. , 1655 – 1713) 的信 “神父贾嘉禄 (Father Amiani) 从南昌府写给主教的信中说，高竹离开这里并留下一个篮子和其他的東西，所以当他路过南京时将向主教上交这些东西……”。

④ Teixeira , *A medicina em Macau* , p. 51. 所引资料为 *Arq. De Macau* , *Junho de 1929* , p. 35.

⑤ Teixeira , *A medicina em Macau* , vol. 3 , p. 51. 所引资料为 *Arq. De Macau* , *Junho de 1929* , p. 35.

⑥ Charles R. Boxer, “A Note on the Interaction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Medicine at Macao and Peking (16th – 18th centuries) ” (十六至十八世纪葡萄牙与中国医学在澳门和北京的互动一记) , in: James Sylvester Cummins (ed.) .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s* , 1450 – 1800 , Aldershot , Variorum (An Expanding World: The European Impact on World History 1450 – 1800) , 1991 , p. 157.

⑦ Teixeira , *A medicina em Macau* , vol. 3 , p. 51. 又见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4.

⑧ *JA* 49 – V – 22 , f. 139r;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 523.

⑨ 卢依道的誓言见 ARSI , *Lus.* 12 , f. 116r.

⑩ MEP , MS 658 , f. 84r.

⑪ MEP , MS 656 , f. 189r.

与葡萄牙保教权的耶稣会士（包括卢依道）之间的关系一向欠佳，这次的见面非常简短。^①而斗争的结果是卢依道两次被传信部处罚，并最终被停止圣职。^②在东京的法国教士甚至给那些已经被卢依道施过洗礼的信徒重新洗礼。^③但在那之后，卢依道继续在东京开展传教工作，据说他最终在这里为多至四万名异教徒施了洗礼。^④耶稣会士米勒^⑤高度赞扬了他的传教活动，他强调，尽管卢依道已经年迈，但仍旧通过驱除恶灵创造了很多奇迹。^⑥甚至当卢依道距离那些着魔的人还有三四里远时，恶灵就已经开始恐慌，并不断地向卢神父求饶。此外，米勒还提到，如果某天一个灵魂都没能被卢依道劝服皈依基督教，他就不进食，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⑦1719年11月4日，卢依道在东京去世，结束了他的人生旅程。^⑧在一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中，我们发现了一句话，可以反映这位极具争议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的一生——“著名的耶稣会神父卢依道，曾经有很多他的流言蜚语，并且至今依旧经常被人们提起，于两个月前去世了。”^⑨

卢依道在中国生活了26年。毫无疑问，如果卢依道当时留在北京，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因为如他自述，当时未能成功医治康熙皇帝间日疟的四名中医都被判以死罪——“皇帝将我免职，未必不是让医生神父〔我〕免于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同样的判决。”^⑩尽管后来其中三个被赦免，“只有”一个被发配边疆，但这一证据清楚地表明，耶稣会医生在为天子行医时面对着真正的风险。在卢依道的事例中，不管怎样，康熙皇帝保护了他，不是因为他是医生，而是因为他是远自“西洋”而来为他效劳之人。与此同时，卢依道有幸离开皇宫一事，被法国耶稣会士自私自利地阐释为一场针对保教权耶稣会士的胜利。

① APF, *Scritture originali della Congregazione Particolare, Indie Orientali e Cina* (下文简称为: *SOCP India Orientale e Cina*), vol. 1711, ff. 159r-v and 173r. 又见 MEP, MS 654, f. 189r 以及 MS 658, f. 386r. 对于那段时期复杂的传教情况的描述与分析, 见 Jean Charbonnier et al., *L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en Asie et dans l' Océan Indien* (在亚洲和印度洋的外方传教会), Paris, Indes savantes, 2007, 以及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教新史), Oxford, Wiley-Blackwell, pp. 17-41.

② DHCJ III, p. 2434. 又见 MEP, MS 684, f. 505r.

③ DHCJ III, p. 2434.

④ APF, *SC Indie Orientali Cina*, vol. 11, f. 15r, *Eloge par Bucarelli* 着重讲述了卢依道在果阿邦的传教工作。同见 ARSI, *Jap. Sin.* 37, ff. 57v. 另一份统计报告(1700年)表明, 在九个月内, 卢依道呈报了下述的工作: “100018 次忏悔, 6089 次圣餐, 910 名受洗的成年人, 710 名受洗的儿童”。见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SP 9, MS 239, f. 49r.

⑤ 米勒 (Balthasar Miller S. J.), 1683 年 7 月 17 日生于法国弗留利 (Frioul), 1702 年 10 月 27 日于维也纳成为耶稣会士, 1741 年 8 月 1 日卒于克罗地亚波热加 (Požega), (Dehergne, *Répertoire*, p. 176).

⑥ Joseph Stöcklein, *Allerhand so Lehr- als Geist-reiche Brief, Schrifften und Reis-Beschreibungen, welche von denen Missionariis der Gesellschaft Jesu aus beyden Indien, und andern uber Meer gelegenen Ländern seit An. 1642 biß auf das Jahr 1726 in Europa angelangt seynd*, Augspurg u. a., Verlag Philips, Martins, und Joh. Veith seel, Erben, 1725-1726 (下文简称为 *Welt Bott*), vol. 1, no 160, p. 43, 米勒于 1718 年 9 月 13 日从澳门写给 Antonius Mordax S. J. 的信。

⑦ *Welt Bott*, vol. 1, no 160, p. 43.

⑧ Dehergne, *Répertoire*, p. 169.

⑨ MEP, MS 655, f. 225r.

⑩ JA 49-V-22, f. 139v;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23. 在同一封信中洪若翰也记述了这一事件; 然而, 他提到的是康熙皇帝出于宽仁之心, 赦免了那些涉事医生的死罪, 而只是将他们流放。洪若翰的话可能是为了与法国耶稣会的目的相一致, 去呈现康熙皇帝“开明君主”的形象。“当他完全痊愈后, 他奖励了所有在他病重时期照顾他的人, 以及那些为他提供药品的人, 即使他并没有用过那些药。但是他也严厉地惩罚了三名太医, 他们在他病重时认为已无药可救。皇帝说: 你们因为害怕医不好我而被治罪, 所以在我处于危急时弃我不顾; 但你们却完全不担心不给我治疗我就必死吗? 他命令刑部审查他们的行为, 依律治罪。刑部拟死刑, 但康熙赦免了他们, 将他们流放了。”见 LEC, pp. 107-108.

结论

所有的神父，都同意，且下定决心，不应该而且绝不能让任何行医之人或懂医术之人再被送入宫廷，就算会因此造成整个传教和基督教的损失；除非这个医生可以使人长生不死，并且证明他曾经成功过，这样他才可能会带来利益而不是损伤。

卢依道^①

上面这段话，写于卢依道信件的结尾处，他试图劝阻更多的接受过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被送往北京，但事与愿违：不但这类人的输入没有停止，反而在未来的三十年内，耶稣会士医生、手术师和药剂师不间断地被成功指派到北京，为康熙皇帝服务。卢依道与高竹只不过是第一批。而使得耶稣会继续这一政策的动机之一，恰恰是他们坚信欧洲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优于中医，这也是耶稣会士不断在他们的信件中所提及的。^② 因此，对于派遣接受过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的风险—收益评估就更倾向于获益方面，正如南怀仁在 1685 年 8 月 1 日的信件中所言，他们将其看作是影响康熙皇帝的一个重要手段。^③

通过以上所有关于康熙年间耶稣会士医生、手术师和药剂师在制度、政治、科学以及宗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的分析，我得出了以下几条结论。基于这些结论，我认为，对耶稣会士医生卢依道以及理发手术匠高竹的个例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模式，即在除了某些特性之外，展示了一系列他们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这些特征也可以在其他后来被派往中国的接受过医学培训的耶稣会士身上找到。首先，从根本上看，康熙的兴趣不在于派送来的“医生”，而在于“手术师”，更确切地说，是“外科大夫”。这在此后的欧洲与中国史料中可以找到证据。^④ 欧洲资料中保存了一道皇帝谕旨的译文，从中可知，对于卢依道和高竹的离开，康熙只是如何渴望可以找到在手术方面替代高竹的人，在他们仅仅离开十三天后，谕旨就被发给了他在澳门的官员。

在中医学里，“外科大夫”的定义包含了各项外科的功能，如排出脓肿和疮，摘除肿瘤，缝合伤口，以及骨伤科如挫伤、创伤、颅骨和四肢骨折，或其他由武器包括火器造成的创伤。康熙

① JA 49 - V - 22 , f. 139v; Soares , *Macau e a Assistência* , pp. 523 - 524.

② 对中医理论的质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在杜赫德（Du Halde）书中“中医”一章的开篇介绍中可以看到“因为他们对物理学一无所知，他们并不知道人体各个部分的功能，因此也不知道引起人生病的原因。他们的科学是基于一种非常模糊的人体构造和系统，所以他们在医学方面的造诣远远落后于欧洲也不足为奇。”见 Du Halde , *Description* , vol. 3 , p. 460. 北京的耶稣会士在信中频繁地质疑中医的医学知识。杜德美（Pierre Jartoux S. J. , 1669 - 1720）在 1711 年 4 月 12 日写给中国和印度修道会总会长的信里，有一段著名的对人参的描写“我确信，在具有药剂学知识的欧洲人手中，通过对人参的性质做化学分析，以及根据疾病的特性适量地使用，人参将会成为十分有用的药材。”见 LEC , p. 183.

③ 事实上，闵明我在其漫长的欧洲之旅中，不但带来了卢依道，也同时招募了药剂师鲍仲义，继卢依道之后于 1694 年来到北京。第二位钦差白晋在他从欧洲回到中国的时候带来了耶稣会手术师樊继训和耶稣会医生罗德宪，如此不断。相较于卢依道的短暂停留，樊继训和罗德宪分别为康熙皇帝以及中国耶稣会服务了 25 和 15 年。见 Puente - Ballesteros , “De París a Pekín , de Pekín a París”。

④ 满文和汉文的资料提供了相同的信息。在耶稣会手术师樊继训去世时，皇帝曾下谕旨“樊继训已故。想以此外科实难得也”。在同一份谕旨中，皇帝指出这个消息应该让“西洋人”知道，并且表达了他急需从澳门再派来一位此类的“外科大夫”的意愿，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任何信仰者。但是，教会当然要确保此人是纯正的耶稣会士：被派遣之人是耶稣会手术师何多敏（Giandomenico Paramino S. J. , 1661 - 1713）。这份满文文件的汉译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523 条，第 284 页。同见 MEP , MS 407 , f. 409. 这一文件译自康熙皇帝的汉文谕旨，被附在孟正气（Jean Domenge S. J. , 1666 - 1735）于 1704 年从西安写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白日升（Jean Basset S. J. , 1662 - 1707）的信中，那一年樊继训去世。原本的汉文谕旨，目前尚未发现。

皇帝格外欣赏这一学科，因为“马背上的朝廷”决定了皇帝和他的随从们需要进行长距离的巡游和征战，而过程中常见的各种疾病使得外科尤为重要。实际上，汉文与满文资料中都记载了很多案例，即受过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治疗有溃疡病症的患者，有时病情很复杂，因为溃疡引起了全身感染。^① 由于外科在中医学中非常薄弱，康熙皇帝也同时利用鞑靼的与耶稣会的手术师，或二者交替使用。因此，在太医院的太医之外，耶稣会的手术师可以以他们的外科技术提供另一种简单但有效的治疗方案。虽然中医也有外科大夫，但是他们的技术并不如耶稣会士或是鞑靼的，治疗主要还是依靠药方。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康熙皇帝只对谁来替代理发手术匠高竹感兴趣。同时，这也证明了，那些仅限于开处药方却没有能力实施手术的耶稣会士医生，例如卢依道，就没有那么不可或缺了。

其次，我们应当关注那些为康熙皇帝服务的受过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的治疗效果问题。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卢依道作为医生期间所经历的困难也同样影响了后来的耶稣会医疗人员。卢依道强调了在诊断病情之后获得治疗药物的困难，更不必说用中国当地的药材制药、试图将药品本土化的艰辛，又不能直接给病人开中药。卢依道还抱怨，病人拒绝听从“西洋”医生的治疗方案。这些病人自觉十分为难，因为卢依道的诊治是康熙皇帝的旨意，但是，如卢依道所说，这些病人最后都会选择中医治疗甚至干脆等待自愈。同时，病人却会让皇帝以及卢依道本人相信，他们是遵循卢依道的医嘱治疗的，所以病人的病情没有好转便会直接归咎于卢依道的错误治疗。最后，从卢依道的叙述以及其他耶稣会医疗人员的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很多病人都是在别无他药可救的情况下才让卢依道治疗的，这也大大降低了他治愈病人的机会。

以上提到的所有因素为将失败归因于卢依道提供了相对的视角。这些因素似乎是他离开清廷的背景，而源于他本身在获得医学学位时缺乏行医的实践。但是，在评判这一点时，我们要避免流于现世论（presentism），即勿以现在的眼光或观念去诠释史料。欧洲医学的专业化始于十八世纪，同时，外科学合法化，并作为单独的学科从医药学中分离出来。然而这一制度和学术方面的伟大跨越并没有使欧洲的死亡率得到明显的改善。事实上，直到十九世纪疫苗的诞生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外科学的加强后，医学的进步才从疗效上体现出来。卢依道得到医学学位是在十七世纪末，当时医学的专门训练还是纯理论的，实践教学则完全不重要。因此，一旦医学理论的学习完成之后，实践的练习则直接在“战场上”进行。对于卢依道来说，他缺乏医疗实践的问题并不在于是他缺少实践教学，因为实践教学在十七世纪末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他缺少经验。他刚刚拿到医学学位，就立即被派遣到了中国，这同时也可见对他的需求之紧迫与重要。这就与其他耶稣会士的背景形成了对比，如鲍仲义（Giuseppe Baudino S. J.），在被派到中国传教之前，在米兰大学担任护士和药剂师多年，为他来北京奠定了雄厚的经验基础。^② 然而卢依道的经验仅限于下述几段经历，一是在来中国的航程中担任船医；二是在果阿邦皇家医院短暂的实习；三是在稠饶（Chorao）修道院实习了几个月；最后在澳门的圣保利耶稣学院工作了一年。在行医不超过两年后，他的经验最终在康熙皇帝那里达到了顶峰。这些事实从逻辑上解释了人们对派遣卢依道赴京的担忧，以及派遣高竹随行的原因。与卢依道不同的是，高竹在治疗方面有长期的经验，但是以他身为理发手术匠的专业而言，在挽救生命方面的能力也很有限。如果我们把他们的经验与他们治愈病人的效果结合在一起比较的话，则二人不相上下。

第三，我们可以说，卢依道的情况和欧洲大部分的世俗医生一样，通过实践获得经验；从我们已知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他的治疗方案和19世纪前欧洲治疗各种疾病所运用的方法完全一致，即沿袭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学的灌肠、通便和放血。卢依道也曾为康熙皇帝进行过通便和放

① 例如：LEC, p. 237. 罗德宪参与了康熙皇帝上嘴唇肿瘤的摘除手术。还有，满文奏折记载了罗德宪为翁牛特王班第治疗溃疡。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565条，第304页。

② Puente - Ballesteros, “De París a Pekín, de Pekín a París”, p. 200.

血。至于他开的药方，则是根据不同的临床症状以及脉搏制定的。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卢依道在为康熙皇帝治疗间日虐时，是如何排除了糖浆和树胶，而决定使用金鸡纳这一治疗各种发热的灵丹妙药。金鸡纳由耶稣会士自美洲新大陆引进，但是在北京十分难得。这一治疗方法与耶稣会士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中充任“archiaters”（“御医”）的状况两相映照。当时，并非医生的耶稣会士、皇家忏悔神父拉雪兹（1624–1709）向法国国王推荐并提供了金鸡纳，来治疗王储的间日疟。

第四，我想指出，卢依道在东京被描述为驱魔人，和耶稣会中其他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专职神父如傅圣泽^①一样，可以用宗教图像或者圣水来“奇迹般地治愈”患者。^②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其他在康熙宫中任职的接受过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在会中的职衔都是辅理修士，而他们则被描述为是通过使用药品来治愈患者的。

第五，我们可以认为，卢依道和其他后续前来的耶稣会医疗人员，成为了与康熙交流欧洲科学知识即“西学”的对话者的一部分。正如我之前的研究中所论述的，^③康熙皇帝任用卢依道和其他接受医学训练的耶稣会士，是把他们当作巩固自己的正统皇权与绝对皇威的工具。一方面，耶稣会士医生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传统医学的欧洲医学知识（理论和实践），康熙皇帝将基于此的观点强加于中国的太医之上。另一方面，对于他皇权网络中的患者，包括皇室宗亲、股肱大臣、尤其是京师之内但也包括外省的高品阶文武官员、皇家侍卫以及其他守卫，皇帝更多地表现出家长式的作风，赐予他们难得的耶稣会医疗人员所提供的另一种治疗方法。从卢依道的信或其他资料中可以看出，他的患者是康熙皇帝本人以及由皇帝推荐给他的病人，包括皇子胤禔、女性患者、官员、伯爵、公主未来的额驸等等，而他们都是满人或蒙古人。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和其他耶稣会医疗人员一样，卢依道在北京时医治的患者有着鲜明的群体特征，使得他与救助贫苦百姓的“仁医”这一传统理念拉开了距离。虽然为平民治病的情况不能被完全排除，但人们对这种理念提出质疑，认为这只是耶稣会士的一种传教手段而非现实，因为那些耶稣会士医疗人员几乎完全专注于为天子和他的皇权网络内的人效劳。实际上，为平民分发药品以实施慈善并不需要专业的耶稣会医生，这可以由任何一名非专业的耶稣会士来完成，比如张诚和殷弘绪^④以及其他人员，已被证实曾实践过。^⑤

第六，我们应该关注，在“马背上的朝廷”中卢依道和其他耶稣会医疗人员组成医疗队、陪同康熙皇帝出巡的背景。然而，由于卢依道与高竹在中国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因此成为皇帝在出巡时随从的机会并不多。资料表明，他们参与了位于鞑靼的热河北巡，通常康熙皇帝会在这里居住三个月来躲避北京夏天的炎热。在此期间，卢依道和高竹也参加了木兰围场的狩猎。很可能卢依道也曾陪同康熙前往位于北京郊区海淀的畅春园。

最后，尽管卢依道在北京和“马背上的”宫廷中都行医，但他并不是太医院的一员，而是属于“非官方医生”^⑥的群体。这些非官方医生包括蒙古医生、针灸医生、喇嘛教医生、道士和产婆等^⑦，即那些拥有各种医疗技术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他们与官方的医生有着直接的竞争关系，因此，他们的疗效是他们被认可和成功的关键所在。康熙皇帝作为支配一切的主宰者，巧妙地编织了包含太医院、中医与非中医的网络，而非中医则是由康熙时不时地、具有策略性地亲

① 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quet S. J.），1665年3月12日生于法国弗泽莱（Vezelay），1681年9月17日于巴黎成为耶稣会士，1741年3月14日卒于意大利罗马。（Dehergne, *Répertoire*, pp. 98–99.）

② 例如：LEC, p. 57.

③ Puente-Ballesteros, “Jesuit Medicine”以及“Antoine Thomas, SI as a ‘Patient’”两文。

④ 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4年2月25日生于法国利摩日（Limoges），1682年9月26日成为耶稣会士，地点不明，1741年7月2日卒于北京。（Dehergne, *Répertoire*, pp. 73–74.）

⑤ 例如：LEC, p. 159 and LEC, p. 242.

⑥ 对于“非官方医生”的定义，请见 Chang Che-chia: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55.

⑦ Puente-Ballesteros, “De París a Pekín, de Pekín a París”, 2. 2. 7. 同见 Puente-Ballesteros, “Jesuit Medicine”.

自将其纳入其中。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医治的成效，由此创造了大清帝国涵盖不同文化的多面的诊治机体。卢依道没有进入太医院，而是由康熙皇帝直接派遣，有时就人为地造成了某种对立的境地，如我们所见，从而引发了冲突。康熙皇帝派遣的耶稣会士医生卢依道与太医院中医之间的冲突，可以被解释为是太医们对于康熙干涉医疗活动采取迂回反抗的产物。

上述七点总结了卢依道医疗活动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很多方面上也同样适用于后续来此的其他耶稣会医疗人员。接下来我将以回顾卢依道使命的特殊情境来结束此文。卢依道被派送来清廷是在国王数学家抵京后耶稣会内部产生剧变的背景下发生的。与此同时，他负有争议的离开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是他没有医治好康熙皇帝的疟疾，而是由法国耶稣会士献上了金鸡纳后才得以治愈，即使这药最初是卢依道建议的。法国耶稣会士对这段情节的描述从来都不提卢依道，因为由此形成的两个因素成为了后来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建立的关键。其一，洪若翰将之视为决定性的因素，即皇帝单独为法国耶稣会士在皇城内划出一块独立的地方。其二，白晋不仅证实了洪若翰的观点，还以此为论据，证明康熙选派他为第二位钦差出使欧洲的正确性。正如柯兰霓所说，大量涌入的法国耶稣会士是由白晋精心安排的，是建立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一种手段，最终由耶稣会总会长在 1700 年正式建立，并拥有了自己的团长。此处有一个疑问：金鸡纳事件是否真如法国耶稣会士所希望表现的那样重要？卢依道自传的情境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可以说，为康熙皇帝献上金鸡纳的故事是相当重要的，但其重要性被过于夸大了。因为正如徐日升和安多所报告的，这只是法国耶稣会士早已精心安排的策略的一部分而已，从他们抵达北京起，就开始步步为营地朝着从保教权耶稣会士中独立出去的方向而努力。实际上，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赞助并由新成立的 *Académie des Sciences* 法国科学院主导下的国王数学家，他们的最终使命是为了使法国在中国获得一席之地，从而摆脱保教权地缘政治的限制。这个策略在欧洲范围内得到了鼓励，如蓝莉 (Landry-Deron) 非常明确地总结道^①，保教权实行的协议受到了新兴大国如荷兰和英格兰的严重威胁，他们不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即使像法国那些忠于天主教的国家，也认为这些限制是不公正的。此外，罗马教廷意识到那时的葡萄牙仅有不足一百万的人口，而且在东方扩张中越来越乏力，于是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和措施，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重夺权威。为此，罗马教廷在 1622 年建立传信部，作为调整传教行政区划的一种方法。除此之外，罗马教廷担心重蹈葡萄牙将精神统治权交给世俗权力的覆辙。因此，基于此背景，康熙皇帝间日疟这件事可以被视为在北京的两个对立的耶稣会派别，即保教权耶稣会士和法国耶稣会士之间建立的对话的一部分。而耶稣会医生卢依道与世俗理发手术匠高竹在北京短暂而跌宕的经历，可以明确地反映出上述两个派别在传教与地缘政治方面的裂痕。同时，对他们自传的分析，使我们在汉文和满文资料之外，看到了康熙皇帝形象的另一面。间日疟事件为我们展现了在那一个月中，康熙皇帝是如何承受了各种治疗方法，从泻药到放血，从中西药品到超自然力量，直到最后来自美洲新大陆的灵丹妙药金鸡纳。因此，康熙皇帝的形象比以往更人性化了，他不再是中国史家给我们塑造的那个完美的“天子”。我们可以看到，康熙就像“基督”一样，也曾受到尘世的苦难和折磨。

(本文原出处: Isidoro Lucci S. J. (1661 – 1719) and João Baptista Lima (1659 – 1733) at the Qing Court: The Physician, the Barber-surgeon, and the Padroado's Interests in China,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82, fasc. 163. 1: 165 – 216. 是基于我的博士论文 “De París a Pekín, de Pekín a París: La Misión jesuita francesa como interlocutor médico en la China de la era Kangxi (r. 1662—1722)” (《从巴黎到北京，从北京到巴黎：康熙时期作为医学中间对话人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博士论文附加医学人文学和社会卫生学的欧洲学位，2009 年) 第三章。这篇论文是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时 (2010 – 2012) 所著，且是在蒋经国国际

^① Landry-Deron, “Les mathématiciens envoyés en Chine”, pp. 427 – 429.

交流学术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在鲁汶大学时的导师钟鸣旦教授 (Nicolas Standaert S. J.) , 以及杜鼎克博士 (Ad Dudink) 为我提供了珍贵的中西方文献资料和重要的研究成果。我也非常感激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为我的论文提供的帮助, 尤其是 Francisco Borja de Medina S. J. , Brian Mac Cuarta S. J. , Mauro Brunello , Carlo Luongo and Francesco Stacca。此外, 我还要感谢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档案馆的管理员 Brigitte Appavou , 感谢她为我在巴黎时的研究慷慨地提供帮助与建议 (2012 年 1 月) 。同时也感谢匿名评审者的评审与修订。

References

- Ana Maria Amaro. *Introdução da medicina ocidental em Macau e as receitas de segredo da botica do colégio de São Paulo*. Macao ,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o , 1992.
- 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ed.) . *Relationes et epistolas fratrum minorum saeculi XVII et XVIII*. Rome , Quaracchi ,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 1942.
- 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09.
- Antonio Sisto Rosso.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 Perkins , 1948.
- 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1644 – 1912)* , 2 vols.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 1944.
-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De París a Pekín , de Pekín a París: La Misión jesuita francesa como *interlocutor médico* en la China de la era Kangxi (r. 1662 – 1722) ”. Ph. D. diss. (European Degree) , 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 , 2009.
-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Kangxi gongting yesuishi yixue: huangdi de wangluo yu zanzhu” (Jesuit Medicine in the Kangxi Court (1662—1722): Imperial Networks and Patronage) . Translated by Dong jianzhong , *Qingshi yanjiu*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1 (2014) .
-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Jesuit Medicine in the Kangxi Court (1662 – 1722): Imperial Networks and Patronage” . *East Asian Science , Technology , and Medicine* 34 (2011) .
-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Kangxi Di de ‘bingren’ Anduo: duiyu Qinggong peiyong diyajiade ge’ an yanjiu” , *Xin shixue* (New History Journal) , vol. 12 (2014) . Translated by Dong Shaoxin 董少新. Revis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article: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Antoine Thomas S. J. as a ‘Patient’ of the Kangxi Emperor (r. 1662 – 1722):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 ,” *Asclepio: Journal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 63. 2 (2012) .
- Catherine Jami. “Tomé Pereira (1645 – 1708) , Clockmaker , Musician and Interpreter at the Kangxi Court: Portuguese Interest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Science” , in: Luis Saraiva and Catherine Jami (eds.) . *The Jesuits , the Padroado and East Asian Science (1552 – 1773)*.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3) , 2008.
- Chang Che-chia.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 – 1908)*. Thesis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1998.
- Charles J. Borges. *The Economics of the Goa Jesuits , 1542 – 1759: An Explanation of their Rise and Fall*. New Delhi , Ashok Kumar Mittal , 1994.
- Charles R. Boxer. “A Note on the Interaction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Medicine at Macao and Peking (16th – 18th centuries) ” , in: James Sylvester Cummins (ed.) .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s , 1450 – 1800*. Aldershot , Variorum (An Expanding World: The European Impact on World History 1450 – 1800) , 1991.
- Charles Le Gobien (ed.) .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is , Le Clerc , 1707.
- Chen Keji , Li Chunsheng. *Zhongguo gongting yixue* (Court Medicine in China) . Beijing ,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 2003.
- Chen Yongsheng , Zhang Sumeng. “Wan Qing xiyixue wenxian fanyi de tedian ji chuban jigou”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Medical Works and their Publicatio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 *Zhonghua yishi zazhi* (China Medicine History Magazine) 2 (1997) .

Claudia von Collani. "Mission and Medicine in China: Between Canon Law , Charity and Science" in Staf Vloeberghs et al. (eds.) . *History of Catechesis in China*. Leuven ,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Leuven Chinese Studies , 18) , 2008.

Claudia Von Collani (ed.) . *Joaquim Bouwet S. J. : Journal des voyages*. Taipei , Taipei Ricci Institute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ew Series; 95) .

Christopher Hamlin. "Chemistry , Medicine ,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English Spas , 1740 – 1840" , in Roy Porter (ed.) . *The Medical History of Waters and Spas* , London ,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edical History Supplement; 10) , 1990.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Oxford , Wiley-Blackwell , 2011.

Dong Shaoxin. *Xingshen zhijian: Zaoqi xiyang yixue ruhua shigao* (Between Body and Spirit: A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in its Early Period) . Shanghai ,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2008.

Dorothy Porter and Roy Porter. *Patient's Progress: Doctors and Docto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Stanford ,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9.

Erhard Rosner. "Über die Einflüsse der Jesuitenmissio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auf die Medizin in China". *Medizinhistorisches Journal* 5 (1970) .

Fortunato Margiotti (ed.) . *Relationes et epistolas fratrum minorum hispanorum in Sinis qui a. 1684 – 92 missionem ingressi sunt*. Isola del Liri , Pisani , 1975.

Georgius Mensaert (ed.) . *Relationes et epistolas illmi D. Fr. Bernardini della Chiesa O. F. M.* Roma , Collegium S. Antonii , 1954.

Georgius Mensaert (ed.) . *Relationes et epistolas primorum fratrum minorum italorum in sinis (saeculis XVII et XVIII)* . Roma , Collegium S. Antonii , 1961.

Guan Xueling. "Kangxichao gongting zhong de xiyang yishi huodong" (Western Medical Activities in the Kangxi Court) . *Gugong bowuyuan yuankan* (Palace Museum Periodical) 1 (2004) .

Guan Xueling. *Qingdai gongting yixue yu yixue wenwu* (Medicine at the Qing Court and Medicinal Relics) . Beijing , zijincheng chubanshe , 2008.

H. Verhaeren. *L' ancienne bibliothèque du Pét' ang*. Pekin , Impr. des Lazaristes , 1940.

Han Qi. "The Role of the Astronomical Bureau in the Catholic Mission during the Qing Period" , in Noël GOLVERS (ed.) . *The Christian Mission of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 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Leuven ,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 1999.

Han Qi. "Antoine Thomas , SJ , and his Mathematical Activities in China: A Preliminary Research through Chinese Sources" , in Willy Vande Walle and Noël Golvers (eds.) .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 – 1911)* . Leuven ,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 Verbiest Foundation , 2003.

Henri Josson and Léopold Willaert.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623 – 1688)* , directeur de l' Observatoire de Pékin (1623 – 1688) . Bruxelles , Palais des Académies , 1938.

Isabelle Landry-Deron. "Les mathématiciens envoyés en Chine par Louis XIV en 1685" , *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55. 5 (2001) .

James F. Burke, "The Mal de la Madre and the Failure of Maternal Influence in Celestina" , *Celestinesca* 17. 2 (1993) .

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 historique , chronologique ,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 4 vols. La Haye , H. Scheurleer , 1736.

Jean Charbonnier et al. *L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en Asie et dans l' Océan Indien*. Paris , Indes savantes , 2007.

Jean-Pierre Duteil. *Le Mandat du Ciel: Le rôle des jésuites en Chine*. Paris: Editions Arguments , 1994.

Jorge Buchan. *Medicina domestica ó Tratado completo del metodo de precaver y curar las enfermedades con el régimen , y medicinas simples y un apéndice que contiene la farmacoepa necesaria para el uso particular. Escrito en inglés por el doctor Jorge Buchan , del Colegio de Médicos de Edimburg , traducido en castellano por el Coronel D. Antonio de Alcedo , Capitán de Reales Guardias españolas*. Madrid , Imprenta Ramón Ruíz , 1792.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 Lisboa , Age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Divisão

de Publicações e Biblioteca ,1950.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73.

Joseph Sebes.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 S. J.*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ocietatis Jesu; 18) ,1961.

Joseph Stöcklein. *Allerhand so Lehr- als Geist-reiche Brief , Schrifften und Reis- Beschreibungen , welche von denen Missionariis der Gesellschaft Jesu aus beyden Indien , und andern uber Meer gelegenen Ländern seit An. 1642 biß auf das Jahr 1726 in Europa angelangt seynd.* Augspurg u. a. Verlag Philips , Martins , und Joh. Veith seel , Erben , 1725 – 1726.

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 J. (1665 – 1741) .*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1982.

Juan Riera. *Capítulos de la medicina española ilustrada (Libros , cirujanos , epidemias y comercio de quina) .* Valladolid ,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 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 ,1992.

Li Shizhen ,*Bencao Gangmu (Materia Medica Arranged according to Drug Descriptions and Technical Aspects) ,* 1596 , Shanghai , shanghai kexue jishu chubanshe ,1993.

Londa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 England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Louis Dulieu. *La médecine à Montpellier.* Paris , Les Presses universelles ,1975.

Louis Van Hee. “Les anciens Jésuites et la médecine en Chine”. *Xaveriana* 135 (1935) .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 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 1552 – 1773.* Changhai ,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M. L. Aime-Martin (ed.) .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 concernant l’ Asie , l’ Afrique et l’ Amérique , avec quelques relations nouvelles des missions , et des note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 Tome troisième , Chine. Paris ,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 4 vols. Macau , Imprensa Nacional ,1976.

Marta E. Hanson. “Jesuits and Medicine in the Kangxi Court (1662 – 1722) ”. *Pacific Rim Report* 43 (2007) .

María del Pilar Cuartero and Maxime Chevalier (eds.) . *Floresta española , escrito por Melchor de Santa Cruz de Dueñas ,* 1574. Barcelona , Critica ,1997.

Marta E. Hanson. “The Significance of Manchu Medical Sources in the Qing , in Stephen Wadley , Carsten Naehrer and Keith Dede (eds.) .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Portland , OR , May 9 – 10 ,2003) ,* Vol. 1: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iesbaden , Harrassowitz Verlag ,1995.

Mauricio Nieto. *Remedios para el imperio: Historia natural y la apropiación del Nuevo Mundo.* Colombia ,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1992.

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 1680 – 178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Noel G. Coley. “Physicians , Chemists , and the Analysis of Mineral Water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Chemistry ? ” in Roy Porter (ed.) . *The Medical History of Waters and Spas.* London ,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edical History Supplement; 10) ,1990.

Noël Golvers.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in the Sciences (17th – 18th Centuries) : The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ections in the SJ Libraries of Peking”. *East Asian Science , Technology , and Medicine* 34 (2011) . 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al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Ronnie Po-chia Hsia. “Tomás Pereira , French Jesuits , and the Kangxi Emperor” , in: Luís Filipe Barreto (ed.) . *Tomás Pereira , SJ (1646 – 1708) : Life , Work and Worl.* Lisboa ,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 I. P. /FCT ,2010.

Roy Porter (ed.) . *The Medical History of Waters and Spas.* London: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Medical History Supplement; 10) ,1990.

Sebald Reil. *Kilian Stumpf , 1655 – 1720: Ein Würzburger Jesuit am Kaiserhof zu Peking.* Münster , Aschendorff

(Missions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und Texte; 33) ,1978.

Severiano Alcobendas. “Religiosos médico-cirujanos de la Provincia de San Gregorio Magno de Filipinas (part IV) : Religiosos franciscanos médico-cirujanos en China”. *Archivo ibero-americano* 36 (1933) .

Tang Shenwen. *Chongxiu zhenghe jingshi zhenglei bencao*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of the Zhenghe Period , Annotated , Arranged by Types , Organized for Practical Use , and Based upon the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Works) , revised by Cao Xiaozhong 曹孝忠 et al. in 1116 and Zhang Cunhui 张存惠 in 1249 , Beijing , renmin weisheng chubanshe ,1957.

Thomas M. Daniel. “The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Respiratory Medicine* 100 (2006) .

W. Devine. *The Four Churches of Peking*. London , Burns , Oates & Washbourne , 1930.

Willy Vande Walle and Noël Golvers (eds.) .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 – 1911)* . Leuven ,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 Verbiest Foundation , 2003.

Yuan Yixiang et al. (ed.) , *Han Ying shuangjie zhongyi da cidia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Beijing , Renmin weisheng chubanshe , 1996.

Yves de Thomaz de Bossierre.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 S. J. (1654 – 1707) , mathématicien de Louis XIV , premier Supérieur général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Chine* (张诚 (1654 – 1707) . Leuven , Ferdinand Verbiest Stichting , 1994.

Zhongguo diyi lishi dang’ anguan (ed.) . *Kangxichao Manwen zhupi zouzhe quanyi*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Imperially Rescripted Manchu Palace Memorials of the Kangxi Period) ,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1996.

Isidoro Lucci S. J. (1661 – 1719) and João Baptista Lima (1659 – 1733) at the Qing Court: The Physician , the Barber-surgeon , and the Padroado’ s Interests in China

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University of Macau; bpballesteros@umac. mo)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Isidoro Lucci S. J. and João Baptista Lima at the imperial court in late 17th-century China. Lucci , accompanied by the barber-surgeon and Macao-born Lima , was the first professional Jesuit physician to arrive in Peking in response to a special request of the Kangxi emperor. First , their complex travel route until their arrival in Peking will be highlighted , as well as how their stay in the Chinese capital gave rise to a conflict within the Jesuit China Mission due to competing interests between Padroado members and the Mathématiciens du Roi. Second , the medical activities of Lucci and Lima at the court in Peking and on imperial tours will be depicted , including their conflicts with Chinese palace physicians. Moreover , it will be shown that caring for elite patients , among them the “Son of Heaven” suffering from diseases and thus being subjected to the crude methods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medicine , moved them far away from the ideal of charitable physicians. Eventually , the causes will be examined that brought the stay of Lucci and Lima in Peking to an abrupt end , being triggered by a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 religious and medical factors working against them.